

臨

時

自

治

區

Hakim
Bey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不知己，豈能勝？

香港從六月份已開始展示某些 TAZ 的徵兆，

以下的社會理論，

為是次民間、自組織性起義

提供最貼切的參考。

臨時自治區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哈基姆·貝

Hakim Bey



ISBN 978-1-64786-945-8

反版權，2019，允許自由地
盜版和引用於其他反版權
作品。

出版 塵緣

翻譯 微光 + 塵緣 + 友人

設計 塵緣

鳴謝 小鳥

出版人翻譯和編印該書的意向為讓讀者將書中概念代入香港當前的氣候中。透過發佈 Bey 的作品，出版人希望協助發展由是次起義所催生的集體意識，以為立即可實現的未來狀態建構出一個綜合視野。

光復香港 | 時代革命

金

「……然而這次我是作為酒神戴歐尼修斯 (Dionysus) 凱旋而來，
我會將世界變成一個狂歡節……這並非說我有很多時間……」

—— 尼采 (Nietzsche)

摘自他給 Cosima Wagner 最後的一封「瘋狂」信札

海盜烏托邦

Pirate Utopia

18 世紀的海上流浪者及海盜建立了一個遍佈全球的「情報網」：儘管原始且主力用於不法業務，這個網絡的運作模式令人欽佩。散佈於整個網絡的有島嶼、可為船隻提供停泊水域及供給的偏僻藏身處、用以交易奢侈品和必需品的贓物等。當中一些島嶼支持「意識社區」¹，一應俱全的微型社區共同有意識地生活於法律之外，並決意要維持這種生活形態，哪怕這只是一段雖短暫、卻快樂的生活。

數年前，我翻閱過眾多二手海盜史資料，試圖從中找出關於這些飛地的研究，但似乎還未見一位歷史學家認為海盜史具有值得研究的價值（William Burroughs 及已故的英國無政府主義者 Larry Law 曾提及過這個題目，但未有進行系統性的研究）。我只好回到一手資料中來建構自己的理論，其中的一些方面將會在下文探討。我稱這些定居點為——「海盜烏托邦」。

最近，Bruce Sterling（科幻小說主義 Cyberpunk 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出版了一本近未來（Near-future）的預言愛情小說，小說假設政治體制的衰敗將導致帶實驗性的各種生活形式去中心化地分散激增：由工人擁有的大型企業、致力於「數據盜取」的獨立飛地、綠色社會民主黨飛地、零工²飛地、無政府主義解放區等。擁護這種多樣性資訊經濟的結構體

1. 意識社區（intentional communities）是一種社區聚落，根據凝聚力與團隊合作而形成。社區的居民通常擁有類似的社會，政治，宗教與靈性的理念，以另類生活方式共同生活。

2. 零工（Zero-work）源自“The Abolition of Work”，Bob Black，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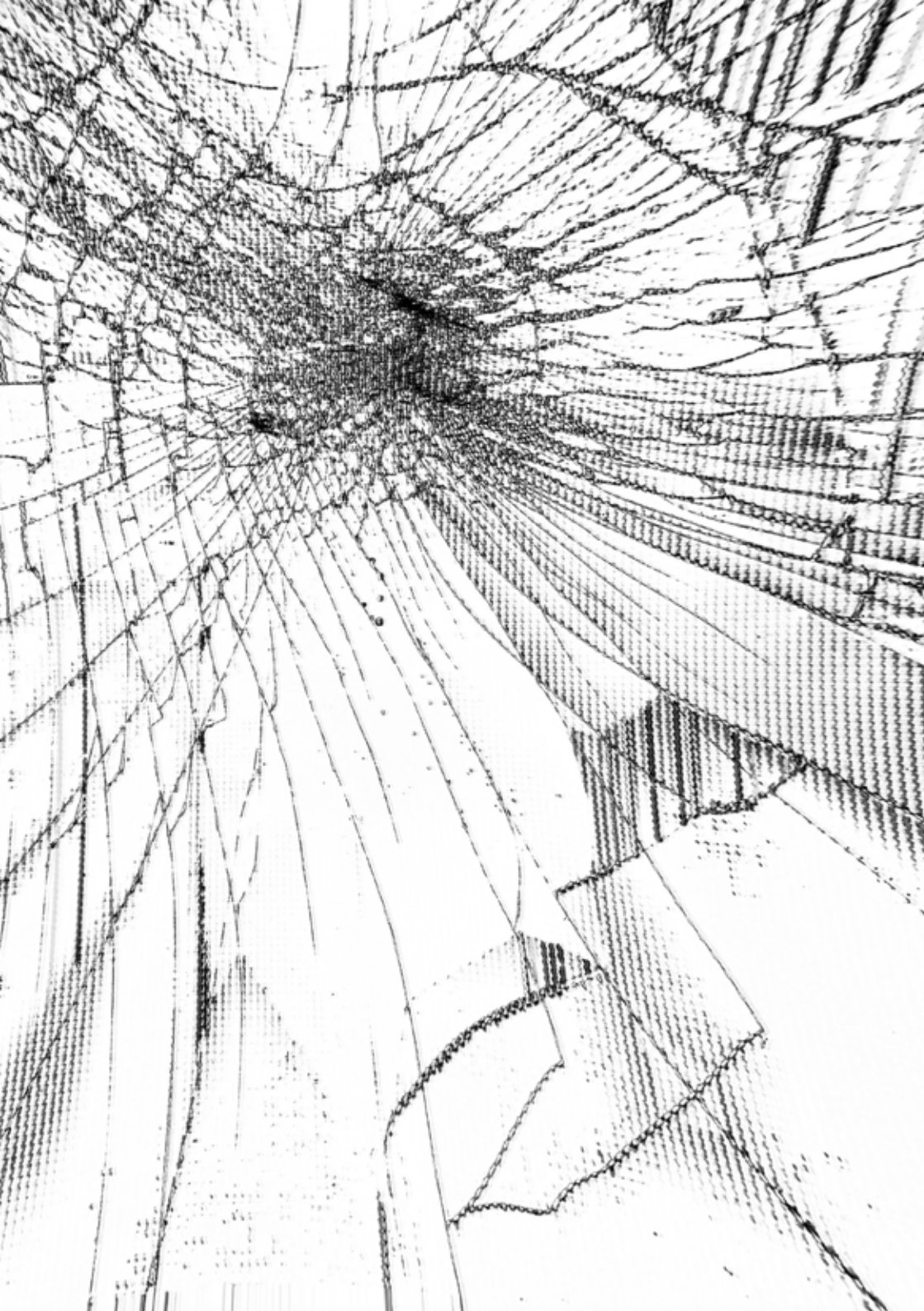
稱為「網絡」(the Net)；那些飛地則被稱為「網絡中的島嶼」(Islands in the Net，同時是該小說書名)。

中世紀的刺客們建立了一個「邦聯」，該「邦聯」是由相隔數千英里的偏遠山谷與城堡組成的網絡、戰略上不易受侵略、彼此透過秘密特工的信息流來聯繫、與所有政府交戰，且只忠於知識。以間諜衛星為頂峰的現代科技，使這種自治成為一場浪漫的夢。不再有海盜島嶼！在將來，相同的技術——不受任何政治形式操控——可使遍佈整個世界的自治區成為可能。但眼下這概念仍只是科幻小說——純屬推測而已。

處身於當下的我們，是否注定了永遠不能體驗到自治，永遠不能奢求在只受治於自由的土地上站上片時？我們是否只能退而緬懷過去或追思未來？我們是否必須直等到整個世界都擺脫政治操控之後，我們當中才有人可聲稱她能理解到自由的真諦？邏輯與情感聯合起來譴責這一種假想。理性令我們堅持人不可能為自己所不知之事奮鬥；而內心則對這個殘酷地將不公不平施加於我們這一代人的宇宙反抗。

說出「直至所有人類(或所有具有感知能力的生物)得到自由為止，我不會是自由的」的，無疑是向一種涅槃的恍惚狀態妥協，是讓出本屬於我們的人性，是將我們自己定義為失敗者。

我相信從「網絡中的島嶼」(Islands in the Net) 的過去及未來故事中推斷，我們可以搜集證據去表明某種「自由飛地」不僅在是有可能，且真實存在於我們這時代。我所有的研究及推測統一地在「臨時自治區」(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以下簡稱 TAZ) 這概念的周圍具體化。儘管它有助於我思維的連貫性，我頂多打算將TAZ視作一篇論文，一個建議，一種近乎於詩意的幻想。儘管我的行文中間或流露出滿腔的熱情，我並不是試圖要建立獨斷的政治教條。事實上，我刻意不去界定 TAZ——我只是圍繞這個主題，連珠炮地發射出試探性光束。到最後，TAZ 幾乎是不解自明的。若這短語流行起來，它將會很容易理解……於實踐中。



等待着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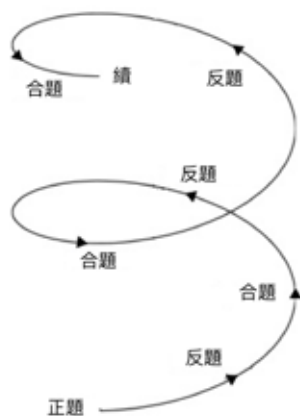
Waiting for the Revolution

為什麼善惡顛倒的世界似乎總有方法扶正自己？為什麼緊隨着革命的總是反動 (reaction)，猶如地獄裡的季節更替？

起義 (uprising)，或是拉丁文的叛亂 (insurrection)，歷史學家選用這些詞語來標籤那些跟預期曲線軌跡不符的動靜——「失敗」的革命。共識認可的唯一軌道：革命，反動，背叛，一個更強大、更具壓迫性的政權到位——巨輪轉動，歷史一次又一次的回歸其最高狀態：踐踏人性尊嚴的軍靴永無休止。

正因為未能遵循這軌道，起義 (英 uprising 意味上升) 一字暗示了在黑格爾螺旋¹「進程」 (progress) 以外的動態，「進程」暗地裏不過是一種惡性循環而已。

Surgo —— 上升、湧動；*Insurgo* —— 上升、升高自己。一個自舉行動 (bootstrap operation)。告別因果循環的可悲戲仿、歷史革命的虛榮。



黑格爾螺旋

1. 黑格爾螺旋 (Hegelian spiral): 通常用於可視化黑格爾辯證法 (Hegelian Dialectic) 的螺旋模型。黑格爾辯證法圍繞著「正反合」理論，通俗解釋是說，有某個正題 A，又有某個反題非 A，A 和非 A 是矛盾的，但又自圓其說地兩者都為真。最後就會出現 B，它把 A 和非 A 的片面真理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具體的真理。

大喊「革命！」為口號已經由警報變異成毒素，一個由惡意的偽靈知派²為公眾宿命定制的陷阱，一場惡夢，置身其中的我們無論如何掙扎，都逃不出那邪惡永世³，這夢魘正是國權 (State)，惡夢一個接一個，纏繞着我們的只是又一個由邪惡天使統管的「天國」。

若然歷史就是「時間」，如其所稱，那麼起義就是一個湧現於「時間」之外的片刻，違反歷史定律。若然國權就是歷史，如其所稱，那麼叛亂就是那個被禁止的時刻，一個對辯證法則不可饒恕的否定——有如祭司在桿上依靠顫動擺弄地爬到屋頂的動作，在宇宙常理眼裡不合邏輯的舞編。歷史說革命取成「永續」(permanence)，或至少有持久性，而起義則是「暫時性」(temporary)的。這麼說，起義就像是一種對於「一般」(ordinary)水平的意識與體驗相比，較扣人心弦的「高峰體驗」(peak experience)。就像節慶歡宴，起義不可能每天都發生——不然它們就不會是「非一般」(nonordinary)。然而，這些激烈的時刻為生活的總體塑造意義。祭司歸來——你總不能永遠在屋頂上躺著——但情況遷移，轉替和整合相遇——發生變更。

你會爭辯說這祇是一個對絕望心靈的輔導服務。無政府主義理想、無國權狀態 (the Stateless state)、公社 (commune)、具持久性 (duration) 的自治區、自由社會、文化又如何？我們是否要放棄那些希望，以換取一些存在主義式的無端行為⁴？重點不在於要改變個人意識，而是在於改寫世界的用戶手冊。

2. 靈知派 (Gnosticism)：與導源於個別經驗的個人知識相比，它通常用指知性知識。又稱靈知派或靈智派。

3. 永世 (Aeon)：在靈知派信仰內，永世是神的一種放射，萬物之源。永世的缺陷，激情，或罪惡，則為非物質的心靈到物質過渡之源頭。

4. 無端行為 (Acte gratuit)：法國哲學作家安德烈·吉德 (André Gide) 所使用的術語，指的是違背常規常理和習俗，完全沒有動機的行為。

我接受這個合理的批評。然而容許我作出兩項答辯：

第一，革命從未成功向我們展示它有實現這理想的能力。那願景獨在革命起動的一刻變得鮮活——但一旦「革命」成功，國權重返，夢想及理念就已經被出賣了。我並未放棄希望，期待改變——但我對革命一詞心存猜疑。

第二，即使自發盛開為無政府文化的起義取代了傳統革命思想，我們這時代的獨特歷史形勢亦非擔此大任的良機。我們對抗的是這終極的獨裁政權，這巨企情報國，這集合公共景觀⁵與擬像現實⁶的社會。跟這帝國正面硬撼只可能會帶來全然徒然的苦難和犧牲。它的槍炮全都對準我們，而我們的粗劣武器可以瞄準的目標就只有

5. 公共景觀 (Spectacle) 的詞典定義是：視覺上醒目的表演或展示。法國哲學家居伊·德波 (Guy Debord) 在他的代表作《景觀社會》(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中將「公共景觀」定義為「市場經濟的專制統治」(autocratic reign of the market economy)。

「公共景觀」是發達資本主義、大眾媒體和各種形式的政府的合流，引致商品關係取代人的關係的社會的顛倒的表像。



6. 擬像現實 (Simulation)：源自尚·布希亞德波 (Jean Baudrillard) 的哲學論文《擬像和模擬》(Simulacra and Simulation)。文中剖析「存有物」(l'être) 跟「外觀」(l'apparence) 的分裂，根據外觀作為基礎的擬像的大量生產，最終導致商業和工業領域主導的社會程式將所有的物體投射出虛擬的存在。由虛擬存在的擬像組成的社會便稱擬像現實。





一個頑固的空虛，一個扼殺資訊網際中每一絲火花的幽靈，一個甘心屈服於藍色恐懼，及被離不開電視的眼睛所統治的罷休社會。最後矛頭指向的，除了一個遲滯現象⁷之外，什麼也不是。

簡而言之，我們並不是要提倡 TAZ 為唯一的終端站，亦非硬稱它能夠取代所有其他形式的組織、策略及目標。我們推舉它，是因為它可以提供以起義為本的改進，而同時又避免不必要的暴力與犧牲。TAZ 就像是場不跟國權直接交戰的起義，一場解放場域（場域可指地區、時期、集體想像力領土）的游擊任務，在國權壓垮它之前自行解散，以便在別處／別時重新編隊。由於國權主要關心的是擬像現實（Simulation）而非實體現實（Substance），所以 TAZ 可以暗中佔據實體現實中的場域，在相對較和平的狀態下繼續

其節日喜樂般的意向。某些小規模的 TAZ 可能已經像那樣地持續了一生，就像遠郊的鄉巴佬巢穴一般——它們從未跟公共景觀相交過，也未從在擬像現實媒介中呈隱形的實體現實過身，所以未有受注意。

7. 遲滯現象（Hysteresis），指一物理系統的狀態，不僅與當下系統的輸入有關，更會因其過去輸入過程之路徑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即系統的狀態取決於它本身的歷史狀態的一種性質。

巴比倫⁸將其抽象概念看成現實；TAZ 正正在此誤差範圍內得以誕生。要開展 TAZ 可能涉及到侵略和防禦的策略，但它最大的優勢在於其隱蔽性——歷史沒有為其編下定義，國權無法認出它的存在。一旦 TAZ 被命名（被代表、被介入），它就得消失，它將會消失，只留下一具空殼，再於別處無形地躍現。因此，在這個無所不在又無所不能，卻同時裂痕空洞遍佈的國權主宰下，TAZ 在這時代是個堪稱完美的策略。亦因為 TAZ 是一個「無政府思夢」中自由文化的縮影，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既能朝著這目標努力，又能同時在此地此刻淺嘗它一些利害的更好策略。

總言之，現實主義不僅要求我們放棄等待「革命」，也要求我們放棄對它的渴求。公共景觀對我們說——即使要冒暴力的風險，起義是越頻繁越好，擬像現實中國權蜃景 (Simulated State) 的抽插轉化成「公眾奇觀」 (spectacular)，轉移群眾視線。在大多數情況下，最好亦最激進的策略其實是拒絕參與公共景觀內的暴力，是退出擬像的境界，是消失。

TAZ 是本體論游擊隊員的駐紮地：邊打邊逃。即使在以數據取代真身的情況下，我們整個部落都要保持移動。TAZ 必須具有防禦的能力；但不論是「攻擊」還是「防禦」，都應該盡可能迴避國權的暴力，一種無意義的暴力。我們的必須針對有助國權灌輸控制的基礎設施，針對它概念的攻擊；防禦則在其「隱蔽性」 (invisibility)，一種武術，及「無敵性」 (invulnerability)——武術中的一種「秘術」 (occult art)。這「游牧式戰爭機器」 (nomadic war machine) 能夠在不被偵測的情況下征服新場域，在國權製版圖有機會調整前繼續行進。至於我們的將來——只有自治者才能計劃自治，組織自治，創造自治。這是一個自舉行動 (bootstrap operation)。首要的一步在某種程度上近似於佛教的開悟 (Satori)——領悟到 TAZ 的實現始於一個簡單的領悟。(the realization of the TAZ begins with a simple act of realization)

8. 巴比倫(Babylon): 用指社會中腐朽的組件，或指墮落無能的社會結構，輕蔑的用語。



在香港遊行必備的雨傘可以用以隱藏用家的身分。

日常生活的心理拓撲學

The Psychotopology of Everyday Life

TAZ 的概念原先來自於對革命的批判，及對起義的欣賞。前者將後者標籤為一種失敗；以解放心理學¹作標準，起義對我們來說代表着一種可能性，比中產階級、共產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等人稱之「成功」革命更加有意思。

TAZ 背後的第二股催生力量源於我稱之為「地圖閉合」(the closure of the map) 的歷史事件。1899年，地球上最後一片未被任何國家認領的土地被吞併了。我們正在經歷第一個沒有未知土地(terra incognita)、沒有疆界的世紀。國籍是治理世界的最高原則——沒有一塊南海小石、一條偏遠山谷，甚至月球與行星，是得以自由、保持開放的。這就是「領土性黑幫行為」(territorial gangsterism) 的完美典型。地球上沒有一平方英寸的土地是不受監管或得以免稅的……就理論上說。

這「地圖」是政治上的抽象網格座標，是「老練的」國權透過威迫利誘薰陶下強制執行的大騙局，直至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那地圖變成領土——不再是「海龜島」²，而是「美國」。然而，由於這地圖只是一個抽象的代表，它不可能 1:1 精準地覆蓋整個地球。面對真實地理環境的碎片複雜性，這地圖可見的只是維度上的坐標格。間尺測量不到的是折疊中隱藏的無限可能。這地圖不精確；這地圖不可能精確。

1. 解放心理學 (Liberation psychology): 旨在通過在概念上和實踐上解決在壓迫性社會政治結構存在的問題，積極地了解貧困和被欺壓社區的心理。

2. 「海龜島」(Turtle Island): 在美洲原住民傳說中，我們的世界是建立於巨大海龜的背上，原住民故稱他們的土地為海龜島。

那麼——革命是封閉的，而起義是開放的。我們暫且避免糾纏於「永久解決方案」，而先將氣力集中在短期的「能量湧動」(power surges)上。



又——地圖是封閉的，但自治區是開放的。打個比喻，自治區在掌控的製圖學 (the cartography of Control) 所看不見的碎形維度內展開。這是我們介紹心理拓撲學(及地形學)的好時機，以反駁國權的地形勘察及地圖繪製，作為「靈感帝國主義」³ 以外的另類「科學」。只有心理地形學⁴ 才能繪製出 1:1 的現實地圖，因為只有人類的頭腦能提供充分的複雜性去仿製現實。但是一幅 1:1 的地圖是無法「支配」它的領土的，因為它實質上跟它的領土無異。這樣的地圖能用於暗示——像是比手畫腳地

3. 靈感帝國主義 (psychic imperialism): 作者暗喻帝國主義能將靈媒通靈一樣，能遠程監察和控制。

4. 心理地理學 (psycho geography): 探討環境和人們對環境的想像如何對人的心理與行為產生影響。以達致藝術與生活之間界限的徹底消散，心理地理學學說建議一系列對沉悶且單元化都市生活作反抗的練習，當中最值得一題的實踐方式為漂移 (dérive)。在實踐中，參與者漫無目的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裏遊蕩，目的是令其偏離生活中的預期路線，以增強對陌生景觀的認識、添加感官多樣性。

指向——某些潛能。我們正在尋找具有發育成自治區潛質的（地理、社會、文化、想象）「空間」；我們亦正尋覓這些空間相對地開放的時機，不論是因國權的忽略，還是它們由於種種機緣躲過製圖者的感官或其他原因。心理拓撲學正是占卜TAZ潛機的藝術。

然而，革命及地圖的封閉只是TAZ的負面性根源；它仍有許多值得著墨的正面性靈感。要提供足夠的能量去「顯化」（manifest）TAZ，光靠反動（reaction）是不夠的。一場起義也必須是為了某明確目的所生。

1. 首先，我們可以談談TAZ的自然人類學。核心家庭是組成共識社會的基礎單位，不過TAZ另有主見。（「家庭！——我多討厭他們！那些對愛吝嗇的人！」——André Gide）核心家庭及其伴隨而來的「戀母情結之苦」（oedipal miseries）似乎是新石器時代的一項發明，對「農業革命」的一種回應。核心家庭斷言自己是一種匱乏，強加階級制度於人身。而舊石器時代模式一看上來就呈較原始及根本：遊群（band）。典型的狩獵-採集（hunter-gatherer）式游牧或半游牧的遊群大約由50人組成。在較大規模的部落社會中，遊群結構是透過多種多樣的團體組成，例如部落裏的氏族、起始/秘密團契、狩獵或戰鬥社團、性別社團、「兒童共和政體」等。若說核心家庭是由匱乏而生（並導致人的吝嗇），那遊群便是由豐裕而生——從而結成了豪奢。家庭是封閉的，源由遺傳學，源由男性對女性及孩童的佔有慾、源由農業／工業社會的階級性體系。遊群是開放的——當然不是對所有人開放，而是對親密團體開放，對愛之諾言下誓的新成員開放。遊群並不是階級制度的一部分，而是延伸家屬、契約與同盟、心靈相近的團體等橫向式的團體習俗。（即使到現在，美洲印第安人社會仍保留着這種結構的某些特質。）

我們置身於後·公共景觀的擬像社會，很多力量一很大部分呈無形——正逐步淘汰核心家庭並恢復遊群社交模式。工作結構的衰變損害了單位住家（unit-home）及單位家庭（unit-family）的「穩定性」。現在，一個人的

「遊群」包括朋友、前任配偶和戀人、在不同工作和社交環境上遇到的人、親密團體、特殊興趣網絡、郵遞通信網絡等。核心家庭變成一個越來越明顯的陷阱，一個文化的滲穴，一個分裂原子裂變的神經質秘密內爆——昭然若揭的反駁策略（counter-strategy）自發地從實際行動中浮現，我們無意中在後工業化時期重新發現古老遊群的潛在價值。

2. 以 TAZ 為節日（festival）。美國作家 Stephen Pearl Andrews 曾經提議以晚餐派對作為無政府主義社會的影像，當中權力機構（authority）的所有階級結構都消融於歡宴和喜慶之中。在此我們還可援引法國哲學家 Fourier 所宣揚，被社會輕視的嗅覺與味覺的重要性含義，及他以感官概念作為社會成型的基礎——「動情撫摸」⁵與「美食鑑賞」（gastrosophy）。古老的禧年（Jubilee）和農神節慶（Saturnalia）概念源自一種民間直覺，某些事件是祇可能在國家與歷史量尺中的「世俗」⁶領域之外發生。這些假期實際上填補了日曆中的空隙——作為閏期間隙（intercalary intervals）。到中世紀，一年中接近三分一的時間都被贈予喜慶節日。

5. 《人類靈魂的熱情·第一冊》（The Passions of the Human Soul, Volume 1），夏爾·傅立葉（Charles Fourier），1851年出版 - 翻譯引文

人的兩個複合感性為觸摸和味道，其中觸摸的含義是比較含糊的，因它有兩種潛在的含義。主要用法很簡單易明，它包括所有不發情的觸摸，純粹是感官中的觸覺；愛，不論是在情感上還是感性上，屬於觸摸一詞的第二用法。因此，當我們說主要用法時，我們將人類的第五感稱為「觸摸」，而在第二用法中，我將其命名為「動情撫摸」（touch-rut），以辨別其兩種用途。

6. 世俗（profane）：Émile Durkheim 在他的學術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中提出神聖世俗二分法（sacred-profane dichotomy）。在該書中，Durkheim 認為神聖與世俗是絕對的二分，是構成宗教最基本的的第一要件。理論中，神聖代表著群體的利益，尤其是團結，體現在神聖的群體符號或圖騰中。另一方面，褻瀆則涉及平凡的個人問題。

在宗教思想落後，人總想回到那個神聖而狂歡的狀態，於是透過定期舉辦節慶活動與特殊節日，並透過反覆的儀式舉動，人們漸次可以再喚醒彼此身上的集體情感，最後共同達到先前的神聖狀態。這就是禧年和農神節等慶典的重要性。

當時反曆法改革的騷亂也許跟「消失的十一天」沒有多大關係，而是更關乎感覺到帝國學正在密謀堵塞年曆中能供給人民自由的空隙——一場政變，一張年週循環的設計藍圖，一種對時間的綁架，本來有機的宇宙被迫安裝上機械發條。節日的死亡。

參與起義的人，即使是在武裝鬥爭、拼命及危險之中，總會注意到其節日般的面貌。起義就像是一個從閏期間隙中滑脫（或被迫消失）的農神節，而它現在得以隨時隨地、突然冒出。儘管不受時地約束，它具有覺察出事件成熟度的嗅覺及對地方守護神（genius loci）的傾愛；心理拓撲學的科學標示出「能量的流動」及「能量地點」⁷，以為 TAZ 作出時空上的定位，或至少有助釐清它跟時機及發生地點的關係。



媒體以商品與公共景觀的合併——「純表象」（pure representation）——去邀請我們「來慶祝您生命中的時刻」。為了回應這種猥褻，我們一方面擁有各種拒絕（refusal）的方式（由情境主義者 John Zerzan 和 Bob Black 等人詳細記述）；另一方面，節日文化⁸的興起使得平時監視大眾消閒

7. 能量地點（power spots）：在傳統宗教思想和神秘主義中，不同的地理位置，因留離的人們感知它們擁有能跟精神能量領域連接的特性，有時被認為聖地。公認的能量地點據稱能強化人們帶給他們的能量，因此，即使在短時間內呆在它們範圍內也能引導精神上的轉變。

8. 節日文化（festal culture）：通過公共慶祝、儀式、禮拜等活動來表達和滿足人類核心需求。

活動的管理員束手無策。事實上，現今的「爭取派對權利的鬥爭」已不是激進派掙扎的仿影，而是那掙扎的一種新呈現，適切於這個聲稱電話能拉近人與人之間距離，電視能替代置身現場的時代。

Pearl Andrews 是對的：晚餐派對已成為「在社會舊殼裏逐漸成形——新社會的種子」⁸。六十年代風格的「部落聚會」、生態性破壞者⁹的祕密森林會議、新異教徒富田園色彩的貝爾丹火焰節、無政府主義研討會、男同性戀圈子……二十年代紐約 Harlem 的房租派對、夜總會、宴會、老派的自由主義聚會野餐——我們要意識到這些通通都是「解放區域」的一種，或至少有成為 TAZ 的潛力。不論是像晚餐派對那樣，只對幾個朋友開放，還是像大型慶祝活動，對數以千計的人開放 (如六十年代嬉皮士



的 Be-in 公共聚會)，因為派對是不被指揮的，所以它總是開放的。經過深思熟慮但最後沒有「發生」的派對仍是一個失敗，它的自發行動性是至關重要的。

派對的精髓：一群人面對面，合力實現彼此的共同願望，不論是為了美食、歡呼、跳舞、交談、生活藝術；甚或是為了情色上的歡愉，再或是

9. 世界產業工人聯盟 IWW 序言 (IWW Preamble)， Pearl Andrews， 1905

10. 生態性破壞 (Ecotage) 是激進環境主義的一種，以環境名義發起的破壞活動，出於環境及政治原因，針對個人或財產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的犯罪。其中最著名的組織為地球解放陣線 (Earth Liberation Front)。

創作公共藝術品，又或是造詣至上的幸福感——簡言之，派對就是「自我主義者結盟」(union of egoists)¹⁰ 最簡單的一個形式——又或者，以沙俄革命家 Kropotkin 的用詞說，是一個促使人們「互助」(mutual aid) 的人性能。(在此我們也應論及法國哲學家 Bataille 的「過剩經濟」及他的誇富宴文化理論¹⁰。)

3. 對塑造 TAZ 現實必不可缺的，是精神遊牧主義 (psychic nomadism) 的概念(或如我們戲稱的「無根世界主義 (rootless cosmopolitanism)」)。哲學家 Deleuze 與 Guattari 的《遊牧論與戰爭機器》(Nomadology and the War Machine)、法國社會學家 Lyotard 的《漂流作業》(Driftworks) 及不同作者在《符號學文本》(Semiotext(e)) 的「Oasis」期刊中，皆論

10) 《被詛咒的部分》(The Accursed Share)，喬治·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1946 - 1949，簡要如下：

過剩經濟，指經濟中任何過剩和不可再利用的部分，必須以不問收益為前題的情況下奢侈地被花費，如花費於藝術，以享樂為基礎的性愛，壯觀又華麗的紀念碑，誇富宴等。要不然，過剩的部分注定會無知地引起災難性的傾瀉。在當代，傾瀉通常等於戰爭，在過去的時代，傾瀉化身為帶摧毀性奉獻和犧牲行為，無論如何，它的出現總是會威脅當時盛行體制的運作。

Bataille 關於禮物、宴會和犧牲的理論深受美洲西北海岸本土文化所啟發，其中的誇富宴為最鮮明的例子。美洲西北海岸原住民的誇富宴文化中，主持者通常是代表強大氏族的酋長或有影響力的人，他們向客人分發大量的禮物和食物，誇張的慷慨程度接近於揮霍無度。贈送財富數額的大小與財富主人及其社區將獲得的聲望和權威直接相關。西北海岸文化中沒有形成國家，而有人類學家所稱的「酋邦」(chiefdom)，誇富宴文化與其競爭性慷慨是具有權威地位的對手們爭奪權力的方式。

誇富宴中禮物的互惠作用以兩種方式產生了氏族和部落的社會團結。

第一，一個共同氏族的成員齊心協力幫助主人積累財富，成功的誇富宴不僅確保財富被重新分配，而且促進政治交易，教化落實，宗教儀式的延續，整個氏族從中受益。

第二，通過主人對客人的恩惠和客人對主人的義務二者之間產生的持續性債務循環，敵對的氏族和主要酋長家庭在友好和競爭的互動中聚在一起。因此，在沒有國家的情況下，禮物和宴會中人格的相互嵌入和混融成為社會整合的中心模式。

及這現象的各個層面。我們在此使用「精神游牧主義」而非「城市游牧主義」(urban nomadism)、「游牧論」、「漂流作業」等詞，僅僅旨在將所有這些概念歸納為一個鬆散的單一綜合體，以便根據逐漸成形的 TAZ 予以研究。令「歐洲企劃」偏離重心的因子——「上帝之死」¹¹——開啟了一個無固定主義思想，多角度的世界觀，我們從這觀點得以「無根地」從哲學遊移到部落神話，從自然科學漫遊到道教——像金甲蟲的複眼看世界，每一個小眼都為視野中的映象帶來截然不同的見解。

但這眼界是以居於當代為代價而得的，在這時代，發展加速和「商品拜物教」¹² 塑造了一種專橫的偽聯合感，它暗地裡模糊了文化的多樣性及個人的獨特性，好使「這個地方跟那個地方一樣好」。這「處處一樣好」悖論催生出「吉普賽人」，一些受渴望或好奇心驅使的精神旅人，對固定主義忠誠度薄弱的漂泊者（例如不忠於「歐洲企劃」理想的歐洲人），不受時地約束，追尋多樣性及冒險……此描述涵蓋的不僅有國際級藝術家及知識分子，還包括移民勞工、難民、「無家者」、遊客、露營車及流動居所（mobile-home）文化——亦包含從不離開自己房間，透過互聯網「旅遊」的人，或「在自己家鄉旅行」的人¹³；最後，吉普賽人包括我們「所有人」，我們這些靠着汽車、假期、電視、書籍、電影、

11. 上帝之死 (the Death of God): 西方現代思想對傳統基督信仰中的上帝概念的，與其提倡的道德觀的捨棄。

12. 「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 由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Das Kapital) 第一卷(1867年)中首創。這詞意謂原始宗教的信仰體系其實還留在現代社會的核心。商品，像前現代社會的宗教，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主流意識佔據中心地位。

13. 在自己家鄉旅行: 摘引自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名言，意指旅行的功能不在於拜訪不同地方，而在於增廣思維和觀點:

“I have traveled a great deal in Concord.”

「我在康科德鎮（梭羅的家鄉）旅行了很多。」

電話、轉換工作、轉變「生活方式」、轉變宗教信仰、轉變日常飲食等等諸如此類來生活的人。

精神游牧主義作為一種策略，Deleuze 與 Guattari 隱喻它為「戰爭機器」，這稱謂將這原為被動的悖論主動化、甚至為暴烈化。「上帝」臨終的苦痛經已持續了如斯漫長的時間一例如以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形式——以至於「上帝」共識的敵人，後巴枯寧、後尼采主義（post-Bakuninist, post-Nietzschean）突擊部隊進行「創意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這些游牧民族實踐進行遠征，他們是海盜，是病毒；沙漠星空下的黑色帳篷營地、過渡區域（interzones）、絲綢之路上的隱藏綠洲要塞、「被解放」的些許叢林與荒地、禁區、黑市及地下市集，他們對 TAZs 既有需要，也有渴求。

這些游牧民族利用不可思議的星象繪製他們的路線圖，這些星象可能是網際上熠熠發光的數據族群，也可能是從幻覺中體會。桌上放置一張地圖；在此之上，放置一張政治變革圖；在此之上，再放置一張網絡地圖，強調加密信息流的「反網絡（counter-Net）」——最後是融合創意性想像、美學及價值觀的 1：1 地圖。網格座標至此變得活現，被意料之外的能量漩渦與湧動、光線、秘密通道和驚喜的凝合賦予了生命。



網絡與維網

The Net and the Web

下一個促成 TAZ 的因素非常廣大且模糊，以至需要佔用一整節的篇幅來論述。

我們論到的網絡 (the Net) 可被界定為所有資訊及通訊傳輸的總和。當中某些通訊只限享有特權的精英階級存取，在網間落下了等級性。其他通訊則是開放給公眾的一故此網絡也具有橫向或非階級性的成分。軍方及情報資料是限閱的，銀行與貨幣資料等亦然。但大部分情況下，電話、郵遞系統、公共資料庫等等都容許任何人士使用。故此，網絡內開始出現一種帶幾分神秘感的反網絡 (counter-Net)，我們稱之為維網 (Web) (如果網絡是個漁網，那麼維網則是在漁網的破損部位及縫隙中編織出來的蜘蛛網)。我們以下將用維網一字來指那些開放的橫向式結構的資訊交流，非階級性的網路；而反網絡這用語則指那些針對維網暗中不法及抵抗性的運用，包括盜版數據及其他榨取網絡的行為。網絡、維網及反網絡皆屬同一個模式複合體——它們在無數交接點上彼此相互介入。這些用語並不是旨為空間劃清界線，而只是指出不同空間內的獨特趨勢。

(題外話：在譴責維網或反網絡的「寄生行為」之先(這行為永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性動力)，請問問你自己，在現今擬像時代下被「生產」到底是什麼，生產階級又是何人？或許你會不得不承認這些用詞似乎都已經失去了它們的原意。TAZ 傾向全然忽略過於複雜的問題與其解答，而只是在系統中選擇它自己可以採用的部分。「文化是我們的本質」——而我們是嗜竊的喜鵲賊，通訊科技世界的狩獵採集者。)

必須預期的是，非正式的維網目前的狀況仍然較原始：邊緣小眾雜誌雜誌（zine）網絡、電子佈告欄系統（以下縮寫作 BBS）網絡¹、盜版軟件、黑客入侵、電話入侵、在印刷及無線電播中的一些牽動，在其他大型媒體中則幾乎完全缺席——沒有電視台，沒有人造衛星，沒有光纖，沒有電纜等等，不一而足。然而，網絡本身呈現出一種主體（「用家」）與客體（「數據」）間關係的模式化轉變／進化。現代哲學家 McLuhan 到 Virilio 等人都已經徹底探討過這些關係的性質了。要「證明」這些現在「人人皆知」的東西，需要大量的篇幅。與其舊調重彈，比較引起我興趣的話題為，這些不斷進化中的關係能否啟發實行 TAZ 的方法。

TAZ 生息於一個雖臨時但確實的位置，那位置可以是一個地址，又可以是一段時期。但它顯然在維網中也應當有其「位置」，且這位置有別於前者，它不為真實，而為虛擬；不為即時，而為瞬時。維網不僅為 TAZ 提供了後勤物流支援，亦有助於 TAZ 的落實；粗略一言，TAZ 可說是同時存在於資訊空間及現實世界中。維網可以將大量的時間轉成數據，再壓縮到極微小的「空間」中。我們在前文提及，基於 TAZ 的暫時性，與那種具有持久性且多少有個固定場所的自由相比下，它必然缺少後者的一些好處。但是，維網可以為 TAZ 的弊處提供替代品——大量被壓縮及「醇化」成數據的時間和空間——以資訊培植初生的 TAZ。

在維網演化進程的此刻，考慮到我們對「面對面」及官能上的需求，我們必須考慮主要將維網視為一個支援系統，一個能因應情況需求將資訊從一個 TAZ 帶到另一個 TAZ、保衛 TAZ、使它「隱形」或賦其爪牙的支援系統。但更重要的是：如果 TAZ 是一個游牧民族陣營，那維網就是部落留存的史詩、歌曲、系譜和傳說的儲存庫；它能輔助開拓秘密商隊路線

1. 電子佈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縮寫作 BBS）是一種網站系統，是目前流行網路論壇的前身，它允許使用者使用終端程式通過數據機（Modem）撥接，或者互聯網來進行連接。大約 2000 年左右，隨著互聯網盛行，BBS 開始邁入衰退期，續漸被現代的論壇取代。

和突襲小道，構成部落經濟川流；它甚至正正包藏了一些她們將步上的路，一些他們將意會為預兆的夢。

維網的存在並不需要依靠任何電腦技術。口耳相傳、郵遞、邊緣小眾雜誌網絡、「電話樹」²等類似方式已經足以建構一個資訊連結網。關鍵並不在於所涉及科技的水平，而在於結構的開放性和橫向性。儘管如此，網絡的整套概念都意味着電腦的插足。在科幻小說的想像中，網絡趨向電子空間（Cyberspace）（就像《Tron》或《神經喚術士》（Neuromancer）中那樣）及構造心靈感應假象的「虛擬現實」。作為 Cyberpunk 迷，我不得不預想到「現實駭入」（reality hacking）將會在 TAZ 的創建上擔當重要的角色。如同 Cyberpunk 小說體裁旗手 Gibson 和 Sterling，我認為帶官腔的網絡是永遠無法滅絕維網或反網絡的——盜版數據、未經授權的傳播及資訊的自由流通是永不可能被冰封的。（事實上，就我所理解，混沌理論（chaos theory）預料任何全面性的控制系統通為不可能實現的。）

然而，撇開所有對未來的區區推測不說，我們必須面對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關乎於維網及當中所涉及的科技。TAZ 很渴望割除中介（mediation），體驗自身最直接（immediate）的存在。整件事的本質是「脯對脯」（breast-to-breast，清真教蘇菲主義者詞彙）的，或面對面的。但是，但是：維網的本體正是中介。機器於此為我們的大使——肉體，除了作為終端機（terminal）——連帶這字眼隱含的陰險意味——之外，是無關緊要的。

TAZ 尋得空間的最好門徑，也許是釐清自己對高科技及其崇拜的網絡看似矛盾的兩種態度：(1) 我們可稱之為第五權³/新·舊石器，後·天然，超原始主義立場（Neo-Paleolithic Post-Situ Ultra-Green position），它視自身為對抗中介及對抗網絡的盧德式⁴論據；以及 (2) Cyberpunk 烏托邦主義者、未來自由主義者、現實黑客（Reality Hackers）及其盟友。他們視網絡為邁向進化的一步，且認為中介可能帶來任何的不良影響都是可以克服的——至少，生產工具、設施、資源一經解放，就有克服中介的可能。

TAZ 認同現實黑客對高科技的看法，因為它希望透過網絡而得以——局部地——成形，哪怕是要透過網絡的中介。但它同時亦認同那些原始人士，因為它保留着覺悟自己為實體 (body) 的強烈意識；對於電子靈知⁵ 試行透過瞬時性和擬像來超越實體的企圖，它只感到厭惡。TAZ 傾向於視科技／反科技的二分化為誤導（就像大部分的二分論那樣）。在這樣的二分下，表面上明顯的對立，結果不過是語義學 (semantics) 導致的曲解，甚至幻覺。換句話說，TAZ 是想活在這個世界中，而不是想活在只在理念上存在的另一個世界中、那些源於虛謬統一體（完全原始化或是完全機械化）的夢幻世界裏、又一個空中樓閣（或如愛麗絲書中所說：「果醬昨天有或果醬明天有，但今天永沒有果醬」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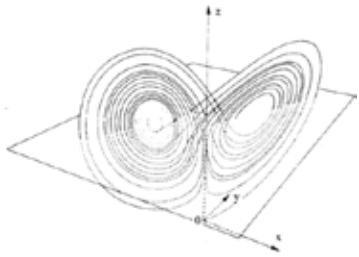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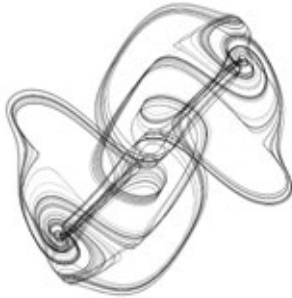
2. 電話樹 (phone trees): 願意打電話傳播信息的人的列表：十個人打電話給十個人，然後那十個人中每個人打電話給十個人。在電子郵件之前，電話樹是傳播信息的最快，最有效的方法。井井有條的樹可能會迅速觸發民選官員熱線泛濫，或協助成千上萬的人通力合作計劃示威。

3. 第五權 (Fifth Estate): 第五權指由網民所組成、對社會和政府的網絡監察，是三權分立政體的伸延。三權分立是現代國家統治模式的一種，其設計將各種國家權力分散，不使其集中在單一機關內，讓這些分立機關產生互相制衡作用。第一權為行政權，第二權為立法權，第三權為司法權。第四權則為媒體、公眾視聽。意指新聞界在憲法裡擔負一個非官方但卻是中心的角色。他有助於公眾了解問題、發表公共見解，因此可以領導和成為對政府的一種制衡，故為三權之外的第四權。現代有新提倡經過網路發展後形成，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個人監督力量應該被考慮為第五權。

4. 盧德主義 (luddite): 19 世紀英國民間對抗工業革命。在該運動中，常常發生工人蓄意毀壞紡織機的事件。這是因為工業革命運用機器大量取代人力勞作，使許多手工工人失業。後世也將反對任何新科技的人稱做盧德主義者。

5. 電子靈知 (CyberGnosis): 認為物理世界是不純淨或低效率的，並且以「純訊息」形式存在是更好的，應該加以追求。基於古老的宗教諾斯替教或靈知教，靈知教認為精神優先於身體，並聲稱物質世界是邪惡的。

6. 愛麗絲鏡中奇遇, Lewis Carroll, 1871, 英語原文 — “Jam yesterday or jam tomorrow, but never jam today.” 書中，白女王提議給愛麗絲「每隔天有果醬」 (Jam every other day), 以誘使她工作，但女王口中「隔天果醬」的真正意思其實是「果醬昨天有或果醬明天有，但今天永沒有果醬」。在現代，該短語被用來諷刺各種未兌現的政治承諾。

	湯馬仕·周期對稱吸引子
勞倫次·奇異吸子	

TAZ 像烏托邦那樣，展望一種激烈化的日常生活，或如超現實主義者可能會所說的：生活中驚奇 (Marvelous) 的滲染。但 TAZ 不能像烏托邦真正的字源意思那樣——不存在的地方 (nowhere) 或沒有地點的地方 (No-place place)。TAZ 確是在某處。它位於無數力量的交匯處，就像連接詭祕地脈古道 (ley-lines) 的異教能量地點，那些看似無關的點滴——地形、風景、氣流、水流、及動物流——都逃不過行家的法眼。但現在這些線路不完全蝕刻在時間和地點上。它們一些僅存在於維網「之內」，儘管它們也會跟現實中的時間和地點相交。也許其中一些線路是「非一般」的，皆因沒有可以衡量它們存在的慣用手法。也許從混沌科學 (chaos science) 去研究這些線路會比社會學、統計學、經濟學等角度較好。這些能生成TAZ的動力規律，跟那些可說是存在於空間維度之間的混沌「奇異吸子」⁷ 有些共通點。

7. 奇異吸子 (Strange attractor): 吸子是微積分和系統科學論中的一個概念。一個系統有朝某個穩態發展的趨勢，這個穩態就叫做吸子。奇異吸子對初始條件敏感。也就是任意兩個極為接近的初始點，在一定數量的疊代運算後，兩者可以相距甚遠。其動態系統在局域是不穩定的，然而廣域看來卻是穩定的，這些動態點再怎麼彼此分離，也都不會離開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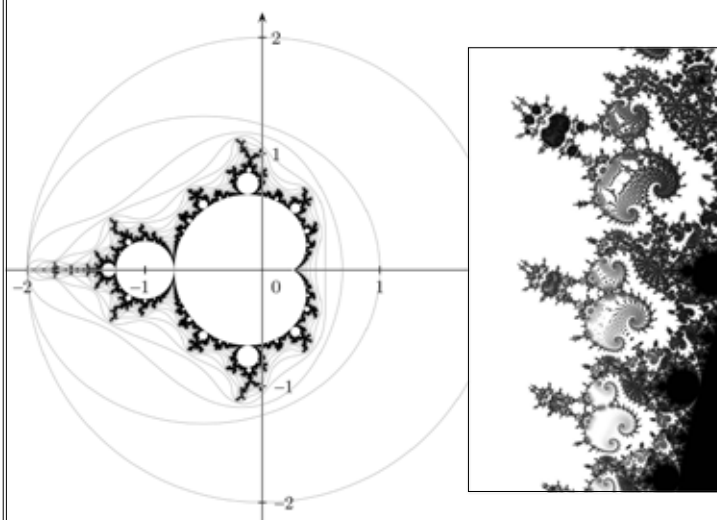
TAZ 本質上會抓住一切可用的手段去自我實現 —— 不論是在山洞裏或是在外太空殖民地，它都能夠生機勃勃 —— 但無論如何它先會活着，在此時、越早越好，無論在多渺茫、多鬆散的形態下，且毫不考慮特定的思想體系，自發地生息。它會使用電腦，因為電腦是其一可用的資源，但它也會使用跟異化 (alienation)⁸ 或擬像風馬牛不相及的力量，以為 TAZ 保證一定的靈感舊石器遊群主義 (psychic paleolithism)，一個能夠「感染」網絡本身的原始薩滿祭司精神 (正是我對 Cyberpunk 的會解)。因為 TAZ 是一股增強力，一個盈餘，一種過剩，一頓誇富宴 (Potlatch)，一場並非於求存而是於享活的人生 (此為 80 年代大眾對社會普遍的鳴咽)，所以它在科技還是反科技議論上沒必要定下立場。硬為它下定義的話，反倒自相矛盾。

在曼德博集合 (Mandelbrot Set，以下縮寫為 M Set) 及它的電腦繪製圖像中我們觀察到，在碎形世界中，地圖是嵌入 (其實是隱藏於) 地圖的地圖的地圖 裏，向內伸延至電腦計算能力的極限。這幅在原則上跟碎形維數度具有 1 : 1 關係的地圖，到底有什麼用途？除了欣賞它富迷幻色彩的優雅之外，我們還能怎樣使用它？

若我們要想像一幅資訊地圖 —— 整個網絡投影成一幅製圖藍本 —— 我們便需要將混沌的特有屬性算進去，例如在複雜的平行處理、電訊、電子「金錢」過戶轉移、病毒、游擊式黑客入侵等等運作中，以上通是混沌的面貌開始顯明的例證。

8. 異化論 (Alienation) : 馬克思 (Marxist) 理論中，工人感到自己失去對自己從事的勞動的控制的狀況。隨著流水線作業和分工的細化，被異化的勞動者與他自己的生產活動、勞動目標、生產過程分離。馬克思將資本主義下勞動的異化劃為四類：

1) 工人與他的「人類本質」的異化； 2) 工人之間的異化，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將勞動化約為市場上待價而沽的商品，而非社會關係； 3) 工人與其勞動產品的異化，因為產品脫離工人自身的控制，反而成為異己的、敵對的關係； 4) 工人與其勞動行為本身的異化，勞動成為無意義的活動，無法帶來真正的滿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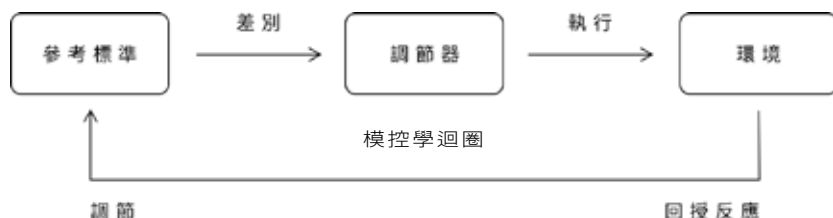
我們可以用類似 M Set 的地形圖去代表每個帶混沌屬性的「區域」，以致數不清的「半島」嵌入或隱藏進地圖裏——它們像是消失了一般。這種部分消失，部分自我隱沒的「墨跡」意味著網絡的削弱，令它對自身的視野變得不完全，根本無法掌控。換句話說，M Set 對於「Plotting」（Plotting 有兩個意思，策劃及標繪）反網絡的崛起作為混沌性工序、作為「創造性進化」⁹ 可能很有幫助。M Set 至少能充當繪製 TAZ 與網絡之間界面的隱喻；TAZ 為網絡中消失了的資訊。網絡中的每一個「災難」都是維網、反網絡的力量交節點。網絡會被具自組性的混沌破壞，而維網則因混沌反而勃發成長。

9. 創造性進化 (Creative evolution): 基本觀點是生物和有機體按照一定步驟依自身能力而向一定方向進化，與外部環境無關。此理論提議進化是由「活力」推動的，「活力」在上文中可以理解為人類本能中自然的創作性衝動。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 Ilya Prigogine 首創的用語。

無論是透過單純的數據盜版，還是跟混沌建立比較複雜的支持關係，維網裏的黑客——TAZ 的模控學¹⁰學者——會利用網絡中的誤差、當機及故障，從這些事端的「訊息熵」¹¹中生成新資訊。作為資訊碎片的蒐集拼貼者、走私家、勒索者，甚至是網絡恐怖份子，TAZ 黑客會致力連接隱蔽於碎形維度中的空間。這些鏈路，連帶在它們中間流動的各種資訊，會為逐漸成形的 TAZ 配備「電源插座」，就像從壟斷能源業者處竊取電力一樣，好為無家的人照亮一間廢棄房屋。

故此，為了製造出有利於 TAZ 的局面，維網會寄生於網絡中——但我們亦可視之為一個寄生策略，作為構建自由且不再寄生的另類自治網絡的其中一步，而這將成為一個「在社會舊殼裏逐漸形成的新社會」的基礎。實際上，我們可以將反網絡和 TAZ 視為目標—但理論上，它們也可被視為在實現另一個現實的旅途中的抗爭。

10. 模控學(Cybernetics)：探索對不同學術體系中控制與通訊科學的調節系統的結構，約束和可能性的跨學科研究。模控學可被應用於研究包含信令迴路的系統。信令迴路在這裡指，當一個系統的運作改變了它所在的環境，而這些改變又反過來回饋於系統上，並導致系統本身的變化。這種循環最初被稱為「循環影響」關係。模控學理論可以應用於許多與系統相關的科學領域，機械人學、神經科學、心理學、社會學、法學等。



11. 訊息熵(entropy)：在訊息論(研究訊息的數學理論)中，訊息熵最好理解為量度變數或者過程當中不確定性的指標，事件的發生概率越小，其「新聞價值」越高，其訊息熵越大。

話雖如此，我們仍須承認對於電腦的某些疑慮，一些問題仍未得到解答，特別是關於個人電腦的。(譯者註：這是作者三十年前的觀點，個人電腦現已成為我們口袋裏的常客。以下關於個人電腦和電子網絡的幾段，閱讀時請抱幾分懷疑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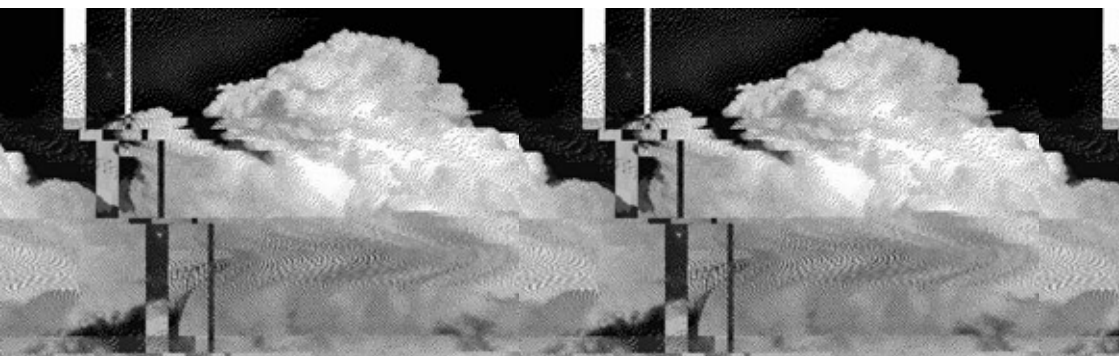
迄今為止，電腦網絡、BBS 及各種電子民主 (electro-democracy) 的實驗故事常被輕視為眾多嗜好 (hobbyism) 之一。很多無政府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深信個人電腦是解放及自我解放的武器——但未見任何實質的利益，亦未有可觸知的自由。

我對那些為大企業及官僚體制經營數據／文字作處理等零碎式粗活的自僱人士，假想的創業階級的浮現興趣缺缺。此外，我不需要第六感都能預知到這種「階級」將會發展出它的下層階級 (underclass) ——無階級意識的雅皮士 (lumpen yuppetariat)：例如家庭主婦將自己的家變成電子血汗工廠，變成以電腦網絡為主子的小型專制統治工場 (Work-tyrannies)，以為家庭提供「第二收入」。

同樣，當代「激進」聯網提供的資訊和服務亦未能動我心弦。人們說某處存在着一個「資訊經濟」 (information economy)。也許吧；但是在「另類」BBS所交易的資訊，似乎全都只是些閒聊及電腦迷的科技交流。這是一個經濟體嗎？抑或只是愛好者的一種消遣活動？OK，個人電腦又創造了一次「印刷革命」——OK，邊緣連結網正在進化——OK，我現在可以同時進行六線通話。但這對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什麼改變？

坦白說，我早已有足夠的資料去豐富我的感觀，像是透過書籍、電影、電視、戲劇、電話、郵遞、變性意識狀態 (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等等。我真的需要一部個人電腦以獲取更加多的相類資料嗎？互聯網能向我提供秘密資訊？唔……或許我會上鉤——但我要求的是那些驚奇的秘密，而非只是些未入冊的電話號碼，或是些警察及政客的

薄物細故。我最想電腦供給我的，是那些關於真實好處 (real goods，英語 goods 又指貨物) 的資訊——那些關於「生命中的美好事物」的資訊，就像世界產業工人聯盟 (IWW) 序言中所說的。而在此，鑑於我正在指責黑客和 BBS 用家那種惱人的理智、知識含糊性 (intellectual vagueness)，我自己必須從富麗堂皇的巴洛克式油畫中的雲端上下來，並在沒有理論與批判 (Theory & Critique) 幫助下解釋我所指的「真實好處」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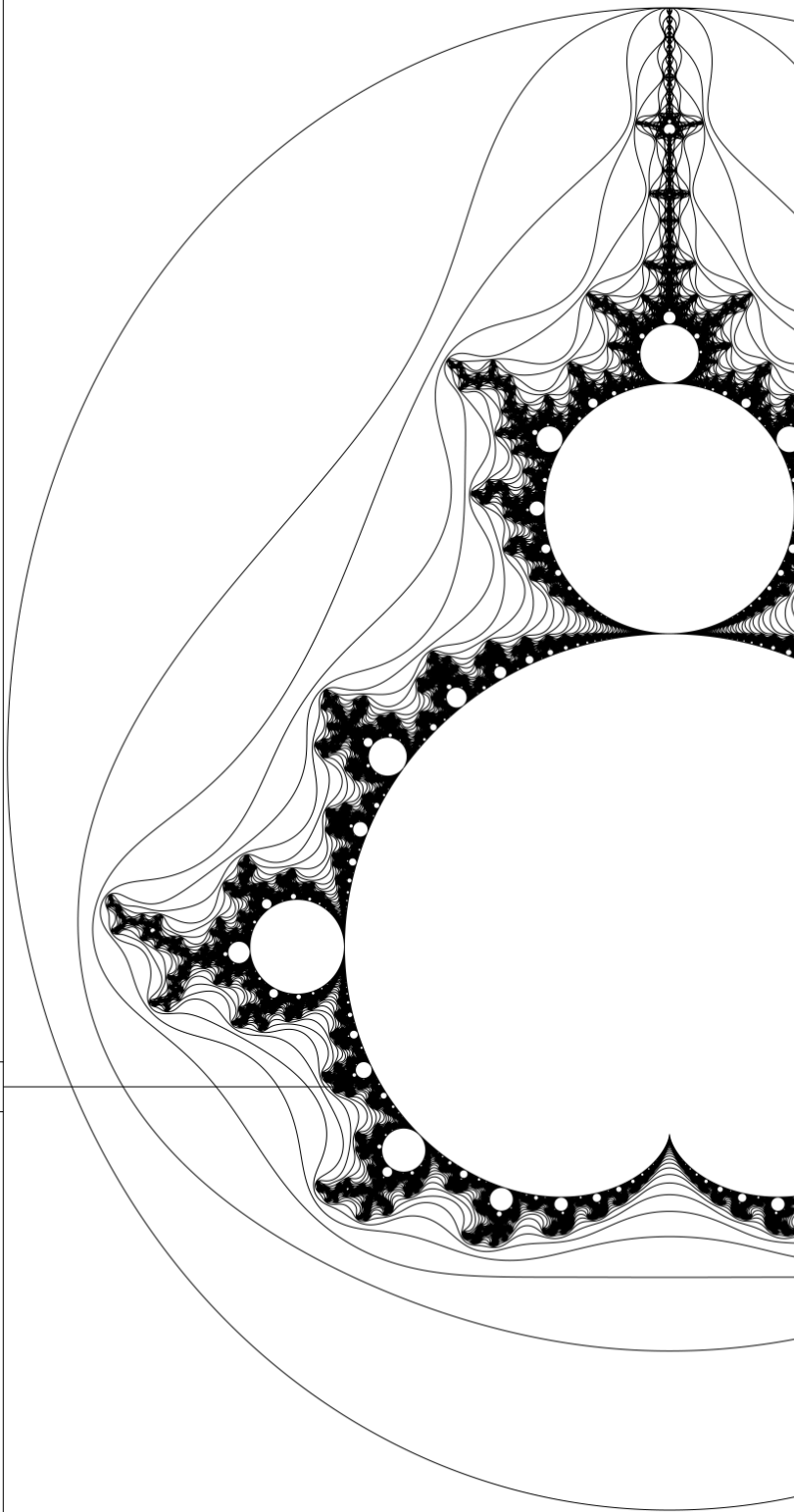


假設出於政治及個人理由，我渴求美食，要比從資本主義中生產出來的更好——未受污染且仍保留着濃郁自然滋味的食物。為了提高難度，假設我切切想望的食物是非法的一也許是未經煮沸的生鮮奶，又或者是精緻的古巴水果 *Mamey*，因為它的種子有致幻作用，所以不能新鮮進口到美國（人們是這樣告訴我的）。我不是農夫。假設我是稀有香水及壯陽藥的進口商，又進一步假設我大部分的存貨都是違法的。又或者我只是想以文字處理服務換取一些有機白蘿蔔，但又不願向國家稅務局上報交易（法律要求必須上報物物交換的交易，信不信由你）。又或者我想跟其他人進行雙方自願但非法的歡愉行為（這實際上已經有人嘗試過了，但所有激烈性愛 (hard-sex) 的 BBS 都被搞破了——缺乏加密保衛措施拖的地下文化能有什麼用？）。簡言之，假設我受夠了機器裏的幽靈——區區的資訊。根據你的說法，電腦理應已有能力助我實踐對食物、毒品、性、逃稅的渴望。那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這都沒有發生呢？

TAZ 已被觸發，正在發生，且無論有沒有電腦，它都將會出現。但要使 TAZ 充分發揮它的潛力，它必須避免自燃，投向成為「網絡中的島嶼」（islands in the Net）。網絡，或更確切地說是反網絡，對承辦 TAZ 核心運作許下諾言，一個會倍增其潛力的加盟——一個對其複雜度和重要性上的「量子躍遷」（quantum jump）（我奇怪這微觀學行話是怎麼被用於表達大跳躍）。TAZ 現在必須存在於一個純空間的世界中，那個感官的世界中。閼限、甚至轉瞬即逝的 TAZ 必須結合資訊和渴望來實現它的歷險旅程、自身的發生，好讓自己活至其命運的界限，浸泡在自身的生氣中。

也許新·舊石器時代學派是正確的一他們宣稱所有形式的異化和中介都必須先被銷毀或離棄，我們的目標才能得以實現；又或如某些未來派自由主義者所斷言，真正的無政府體系只會在外太空才實現得到。但 TAZ 並不十分關注「過去」或「未來」。TAZ 感興趣的是結果、那些對共識現實（consensus reality）的成功突襲、突破進那些更激烈、更豐盛的人生。如果這個企劃用不了電腦，那麼我們便必須克服電腦。然而我的直覺告訴我，反網絡已經逐漸成形，甚或已然存在一但我無法作出證實。我的 TAZ 理論很大程度是建基於直覺。當然維網亦牽涉到非數碼化的交換網絡（如地下出版刊物（samizdat）、黑市等），但從邏輯上說，富巨大潛力的非階級資訊聯網從邏輯上臆測電腦為實現其意向最合適工具。我正等待着黑客來為我鑒證，證明我的直覺是站得住腳的。我的白蘿蔔在何方？

你 在 此



往克洛坦去了

Gone to Croatan

我們無意為 TAZ 下定義，亦無意獨斷地陳述出一套教條，去制定生成它的方劑。我們只是主張它曾經被建立，將被建立，且正在被建立。因此，考察過去及現在的一些 TAZ，然後推測 TAZ 將來的各種面貌，可能對我們來說更有價值和趣味。透過勾憶起幾種樣板原型（prototypes），或許我們可以估算出這類複合體的潛在規模的廣度，甚至可能得以窺見它的「原始型」¹。與其嘗試去編輯一本百科全書，我們倒不如採用散彈策略，締造一幅由各種「瞥見」剪貼而成的馬賽克鑲嵌圖，並隨意地以 16-17 世紀和北美洲新世界的殖民為起點。

「新」世界的開拓源於一個由術士喚起的神秘主義任務。占星師 John Dee 是伊麗莎白一世的精神顧問，他似乎發明了「魔幻帝國主義」（magical imperialism）這概念，感染了一整代的人。英國探險家 Halkyut 和 Raleigh 亦受其迷惑，Raleigh 更利用他跟「黑夜學院」（School of Night，由前衛的思想家、貴族和大師組成的知識分子秘密晚間研討會）的關係，進一步推展探險、殖民及繪製世界地圖的大業。威廉·莎士比亞的戲劇《暴風雨》（The Tempest）正是這個新思想體系的政治宣傳作，而羅阿諾克殖民地²則是它櫥窗中的第一個實驗。

1. 原始型 (archetype) 是首創的模型，代表同一類型的人物、物件、或觀念。原始型為題目提供可預測性。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原型多數是在電影和文學作品內的角色原始型，一些常見的角色原始型例子：

1) 羅密歐與茱麗葉：遭遇家人反對為愛殉情男女的原型，相似於中國故事中的梁山伯與祝英台，都在不少後來的創作中再用。

2) 老智者：星際大戰中的尤達、魔戒中的甘道夫等。

新世界以其煉金術角度，將這個新思想體系跟原物質³拉上關係，是「大自然國度」⁴，單純且帶着無限可能（「維珍尼亞」⁵），是術士煉「金」用的初起混沌³，亦即能臻至心神精髓連帶物質上的豐盛。但這種煉金術視野，在某程度上反映出它對於這種原初（inchoate）的真切著迷，對它暗地裏的同情，它對非形之形（formless form）的渴求取了具象徵性的「印第安人」為其焦點：未受「政體」腐化，活在大自然國度中的「人類」。野人卡利班⁶像病毒般寄宿魔幻帝國主義的機器中；而森林／動物／人類從一開始就被施以邊緣化、被蔑視和被驅逐遺棄的魔術。一方面，卡利班是醜陋的，大自然則是「怒吼的荒野」；另一方面，卡利班高尚而不受束縛，大自然則為伊甸園。這歐洲意識的分裂早於浪漫／古典主義二分之前已經出現，它深植於文藝復興的高等魔術之中。新大陸的發現（連帶黃金國、不老泉等傳說）把這二分意識具體化，令殖民計劃的步伐加速。

2. 羅阿諾克殖民地（Roanoke Colony）：因在 1585 – 1590 期間殖民地人口無法解釋的消失，而被稱為遺失的殖民地（Lost Colony）。英籍物資船在 1590 年發現殖民地人口失蹤，定居點有加建駐防設施但被廢棄，並發現「Croatoan」一詞刻在附近木柵上。當今大多數歷史學家推測他們可能與附近的友善的美洲印第安人社區同化齊存以緩解生存上的種種必須。

3. 原物質（materia prima）：在煉金術中，它是所有物質的原始無形基礎，類似於道教中宇宙萬物的本原、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道」，日本佛教五大中的第五大「空」，或古希臘創世神話中宇宙誕生之前的「混沌」/ 虛空狀態。資深的煉金術士也會用宇宙靈魂——世界上所有生物之間的內在聯繫——作比喻來形容原物質。

4. 大自然國度（state of Nature）：又譯自然狀態，是一個假想狀況，幻想人類在社會狀態存在以前的生活狀況，無分國界，沒有政制的束縛。

5. 維珍尼亞（Virginia）：維珍尼亞州是美國最古老的一個州，州內的詹姆斯鎮是上文提及的英國冒險家在美洲建立的第一個永久性的殖民地。維珍尼亞的英文為 Virginia，其中 Virgin 是處女的意思，帶有單純且帶着無限可能的含義，這命名表現了當時殖民者對新世界懷有的期望。

6. 卡利班（Caliban）：卡利班是《暴風雨》中的重要角色。他在戲中因其醜陋、半人獸外表而飽受主角普洛斯彼羅（Prospero）的不公對待和虐待，故在二十世紀後期他的角色被採納為殖民者壓迫美洲原住民，白人壓迫黑奴等黑暗的歷史的象徵。

在小學時，學校教導我們羅阿諾克的第一個殖民以失敗告終：殖民者消失了，只留下了一個含義隱晦的信息：「Gone To Croatan (往克洛坦去了)」⁷。後來有關「灰眼睛的印第安人」的目擊報告都被當作是傳說而被束之高閣。從教科書所暗示，那些手無寸鐵的殖民者全被印第安人屠殺了。但是克洛坦並不是什麼黃金國，它是一個友善的相鄰印第安部落的名字。顯然那個殖民定居點只是由沿海地區移進了大迪斯莫沼澤 (Great Dismal Swamp)，並已融入該部落。而且灰眼睛的印第安人是真有其事——他們仍在那裏，並仍舊稱自己為克洛坦人。

由此可見，新世界第一個殖民地選擇放棄跟普洛斯彼羅⁷ (Dee／Raleigh／帝國) 簽下的契約，轉而選擇跟卡利班一起成為「野人」。他們掉隊了，成為「印第安人」、發「土著」瘋，挑選混沌，背棄了為倫敦的財閥及知識分子服駭人的農役。

當美國在美洲原住民稱為「海龜島」的土地上興建時，克洛坦仍然嵌於其集體精神 (collective psyche) 中。在邊界之外，大自然國度 (i.e. 沒有國權) 仍佔上風；而在殖民者的意識裏，亦潛伏着原始野性的選項，以廢棄教會、農耕、讀寫、稅金——所有文明生活擔子——的誘惑，餌使他們「往克洛坦去」。再者，因為英格蘭革命先後被英倫聯邦護國公 Cromwell⁸ 及王政復辟出賣，大批新教/非國教激進分子紛紛逃逸，或被運送至新世界 (新世界現在成了一個監獄，流放之地)。不同幫派的非國教徒⁹ 在拓荒時窺見了原始野性的魅惑，並急於擁抱它。

7. 普洛斯彼羅 (Prospero): 《暴風雨》中的主角，劇作家把他刻畫成一位英明高雅的公爵。但公爵的行動與他的描寫在現代人眼中看來正好相反，他在戲中以殘酷的魔法威迫醜陋的卡利班去服從他。

8. 克倫威爾 (Cromwell): 在 1646 年和 1648 年贏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針對保皇黨和國王查理一世的英國內戰，但最後在其他掌權者邀請下擔任英倫聯邦之護國公，很快成為其他人的常識稱呼他為「殿下」。他推行了積極有效的內外政策，在相當程度上塑造了英國的未來。

Anne Hutchinson 和她的友人們¹⁰ 因她的上流社會地位，成為最為人所知的反律法主義者鬥爭——不幸地被捲入殖民地的政治風波中——但一個更為激進的派系運動無疑地在聚光燈外存在。19世紀美國小說家Hawthorne在《歡樂山的五月柱》¹¹ 中講述的事件完全是基於史實；



那些極端主義者決定徹底拋棄基督教，重投異教懷抱。如果他們成功跟其印第安盟友聯合，那結果可能會是一個反律法主義／異教／印第安的混合宗教，類似 17 世紀北美的 *Santeria*¹²。

9. 作者在書中提供的非國教徒例子有反律法主義者 (Antinomians)、家庭主義者 (Familists)、離群的貴格會成員 (Quakers)、平等派 (Levellers)、挖掘派 (Diggers) 和激進者 (Ranters)。

10. 十七世紀時，部分美洲殖民地清教徒 (Puritans) 與當地清教教會的教義意見分歧，批評殖民地的牧師宣揚工作的聖約，而不是恩典之聖約。其最著名的案例為 Anne Hutchinson 每週在自己家中舉行恩典聖約的清教講道聚會，引起與殖民地的部長們相持不下的反律法主義之爭。

11. 《歡樂山的五月柱》(The Maypole of Merry Mount): 故事中，歡樂山的異教徒生活於實行自由主義的殖民烏托邦，他們和鄰近的印第安人融洽共處，並結交通婚。掌權的清教教會視歡樂山住戶為褻瀆迷醉的自由放蕩者，加以欺榨壓迫。

12. 薩泰里阿教 (Santeria): 非洲西部的約魯巴教受羅馬天主教、美洲原住民宗教、古巴精神主義影響合流而生的信仰系統。

在加勒比地區較為寬鬆及貪腐的政府管治下，偏離主流宗教的宗派成員得以茁壯成長。歐洲各個利益集團於該地區相爭，為避免衝突，許多島嶼被荒廢，無國認領。相信很多極端主義者都已在群島（特別是現今的巴巴多斯和牙買加）定居了，且我認為是平等派和激進者的影響，促成了西印度海盜（Buccaneer，又譯自由航海員）在海地北部海岸的Tortuga島落成「烏托邦」。多虧作家和海盜Esquemelin，讓我們首次得以在此稍為深入地研究一個成功的新世界TAZ原型。逃離了帝國主義那些可憎的「好處」，如奴隸制、農奴制、種族歧視及偏狹心胸，逃離了兵役的折磨及開墾種植園（Plantation）行屍走肉的生活，海盜們採納了印第安人的風俗—跟加勒比人通婚、平等接納黑人和西班牙人、拒絕一切國籍、以民主方式選出他們的船長，回歸「大自然國度」。宣稱自己「與全世界交戰」後，他們以「條款」合約（Articles）為共識下出海並四處劫掠——主張平等的「條款」平分贓物，每位成員都能分得一全份額，而船長通常只有1 1/4 或 1 1/2 份額。禁止鞭刑及刑罰——紛爭都是以投票方式或決鬥法（code duello）解決。

過往有些歷史學家將海盜僅僅視作在遠洋航行的盜賊，甚至是資本家的原型，以上所述的視角是全然錯誤。就某種意義來說，他們是「社會土匪」¹³，雖然他們的社區根基不是傳統的農民社會，而是在未知土地上，幾近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來的「烏托邦」，是佔據着地圖上空白區域、完全自由的飛地。Tortuga淪陷後，西印度海盜的理想仍然繼續存在於整個海盜「黃金時期」期間（約1660–1720年），並造就了諸如由他們建立的伯利茲（Belize）殖民地。接着，隨着場景轉移到馬達加斯加——一個仍未有任何帝國勢力對之宣示主權、且僅由各個渴望跟海盜結盟的原住民國王（酋長）大雜燴統治的島嶼—這個海盜烏托邦升至其最高形態。

13. 社會土匪（Social bandits）：是下層階級進行社會抗爭的常見形式，涉及以法律透鏡中被視為違法的行為，但得到廣泛社會在道德觀和執行上的支持。

著名海盜
著名海盜
著名海盜



Anne Bonny
Anne Bonny
Anne Bonny
Anne Bonny

根據某些歷史學家所稱，英國新聞作家 Daniel Defoe 對海盜船長 Mission 及由他創立的自由權國 Libertatia¹⁴ 的記述，可能只是一個宣傳激進維新黨理論¹⁵ 的文學騙局——但它被納入《海盜通史》（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Pyrates, 1724–28）一書中，而這書的大部分描述仍然被接受為真實準確的。此外，當此書出現時，船長 Mission 的故事並未受到批評，且當時很多富經驗的馬達加斯加老手海員仍然倖存。他們似乎相信它，這無疑是因為他們經歷過跟 Libertatia 十分相像的海盜飛地。再一次地，被解救的奴隸、原住民，甚至是慣常的敵人如葡萄牙人，都被一視同仁地邀請加入飛地。（解放運輸奴隸的船為他們一夥的重心。）土地是共有的，代表是經選舉選出且任期短，贓物是共享的；他們宣揚的自由主義比 *Common Sense* 所理解的要徹底得多。

自由權國 Libertatia 希望能夠一直堅持下去，但 Mission 卻在保衛它的戰役中陣亡了。然而，大多數的海盜烏托邦理應是暫時性的。事實上，海盜們的真正「共和國」是他們在條款之下航行的那些船隻。那些沿海的飛地通常完全沒有法律。最後一個經典例子是巴哈馬的拿騷（Nassau），一個海濱度假勝地，那裏的棚屋及帳篷都是專為酒香、女人（很可能還包括少年——從 Burg 的《雞姦與海盜行徑》（Sodomy and Piracy）所判斷）、歌曲（海盜極其喜愛音樂，經常為整個巡航僱用樂隊）及無恥的奢侈而設的；但當大不列顛艦隊出現在海灣時，它一夜間便消失了。著名海盜船長黑鬍子（Blackbeard）和「棉布傑克」拉克姆（“Calico Jack” Rackham）及其女海盜船員繼續向更野性的海岸及更險惡的命運前進，而其他則懦弱地

14. 自由權國（Libertatia）：Libertatia 據稱是一個由海盜船長 Mission 鍛造的無政府主義殖民地。Mission 認為在一個社會中，各種膚色、信仰、信念的人們都不應受到任何監督審查。Libertatia 是一個由自治社區管理的城市，一個由勞動者擁有的海盜集團。

15. 激進維新黨理論（Radical Whig theory）：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指出自由社會中的個人必須嫉妒捍衛自己的自由，並對任何政府的侵犯行為保持警惕。該理論認為，自由很難保持，更容易失去。

接受了特赦，改過自新。但是海盜傳統仍然持續。在馬達加斯加，海盜的混血孩子們開始開辟出他們自己的王國；在加勒比地區，逃亡的奴隸，以及黑／白／紅人的混血群體，在山區及內陸偏僻地區以「栗紅(Maroons)」的身份茁壯。美國民俗學家 Zora Neale Hurston 在 1920 年代訪問牙買加時，那裏的栗紅社區仍然保留着一定程度的自治及很多古老的社會習俗（詳情請參閱《告訴我的馬》(Tell my horse)）。南美洲蘇里南共和國的栗紅人至今仍然信奉非洲「異教」。

在整個 18 世紀，北美洲還產生了一些脫離主流的「仨種族隔離(triracial isolate)社區」。(這個聽起來充滿醫學感的用語是優生學運動¹⁶所創的，該運動對這些社區進行了首次的科學研究。不幸的是，這種「科學」只是充當了仇恨種族「混種」和窮人的藉口，而「解決問題的方法」往往是強制絕育。)這些社區的核心成員通常是逃亡的奴隸和農奴、「罪犯」(i.e. 陷入貧困的人)、「妓女」(i.e. 跟非白人結婚的白人婦女)及各種原住民部落成員。在某些個案中，傳統的部落結構會吸納新人，例如北美洲的塞米諾爾人(Seminole)和切羅基人(Cherokee)；至於其他情況，則是形成了新的部落。因此，我們有持續了 18 和 19 兩個世紀的大迪斯莫沼澤的栗紅人，他們吸收了逃亡的奴隸，承擔着地下鐵路¹⁷小站的作用，並充當奴隸叛亂心態中具宗教元素的思想中心。他們信奉胡都(HooDoo)，一種集非洲、原住民和基督教元素的混合物，且根據歷史學家 H. Leaming-Bey，該教元老及大迪斯莫的栗紅首領皆被稱為「七指高光」(the Seven Finger High Glistler)。

16. 優生學(Eugenics)是一個信仰體制，主張通過人為手段來改進國民遺傳基因質素。由於「基因不良」的定義有很大的主觀性，而優生學提倡的手段例如強制絕育或移民限制等，很多時違反人權及引起道德上的爭議，所以這類想法在現代意識下飽受抨擊。

17. 地下鐵路(Underground Railroad)是十九世紀在美國經營秘密路線網絡和避難所的結社，用來幫助非裔奴隸逃往自由州和加拿大，並得到了廢奴主義者和同情者(包括白人、自由身黑人、奴隸)的支持。

新澤西州北部的藍馬坡格族 (Ramapaughs , 也被低貶稱為 Jackson Whites) 展示了另一種浪漫和原始型的系譜：荷蘭籍莊園領主解放的奴隸、特拉華州內 Algonquin 的各個印第安氏族、飛地常客「妓女」、「黑森人」 (Hessians , 指丟失的不列顛僱傭兵、掉隊的親英保皇派等等的一個流行語) 及當地社會土匪幫 (諸如 Claudius Smith 所率領的游擊隊) 。

某些混血群體聲稱擁有非洲伊斯蘭的血統，例如特拉華州的摩爾人 (Moors) 及在 18 世紀中期從肯塔基州移居至俄亥俄州的本·以實瑪利人 (Ben Ishmaels) 。以實瑪利人實行一夫多妻制，從不喝酒，以吟遊詩歌為生，與印第安人通婚並採納他們的習俗，獻身於游牧主義中，甚至把他們的房屋都建於輪子上。他們以三角形路線進行年度遷徙，經常以伊斯蘭教聖城 (麥加 (Mecca) 及麥地那 (Medina) 等) 命名新成立的移民邊鎮。在 19 世紀，他們當中一些人擁護無政府主義理想，並被優生學家看成格外兇殘的屠殺計畫的目標——一種以滅絕當為救贖 (salvation-by-extermiation) 的集體屠殺。一些最早期的優生學法律就是為向他們致敬而通過的。他們整個部落在 1920 年代「消失」了，卻可能取而代之地令到諸如摩爾科學聖殿 (Moorish Science Temple) 一類的早期「黑人伊斯蘭」教派的人數上漲。我是受鄰近的新澤西州松林泥炭地 (Pine Barrens) 的「柯里柯克家庭」¹⁸ 傳說影響長大的 (當然 HP Lovecraft 也受到這些傳說影響——他是一個著迷於隔離社區的狂熱種族主義者) 。結果證明，這些傳說只是優生學家的誹謗殘，並留於民間記憶的產物。美國總部位於新澤西州的 Vineland 鎮的優生學家們，對泥炭地的「異族通婚」及「心智失調」進行了慣常的「改革」，包括顯然經過後期粗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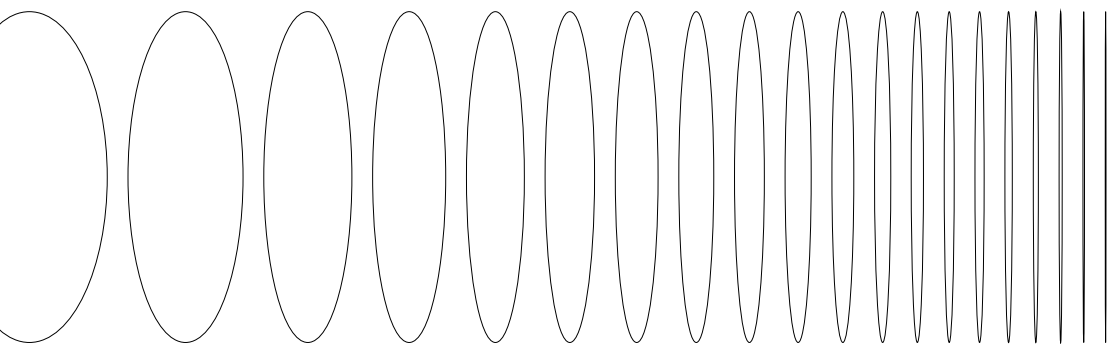
[18] 柯里柯克家庭 (Kallikaks)：美國優生學家 Henry H. Goddard 以 Kallikaks 為代名，用真實的案例分析優生學論生造的所謂「心智失調 (feeble-mindedness)」病的遺傳性。由於優生運動的目標是未受過教育的窮人，Kallikaks 一詞，以及「朱克家 (Jukes)」和「南家 (Nams)」等類似性質的案例研究，成為美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文化簡稱。

修改的柯里柯克家庭成員照片，務求使照片中人看起來像是產自錯誤配種（misbreeding）的怪物。

那些「隔離社區」——至少是那些直到 20 世紀時仍得以保留其身份的社區——堅拒被主流文化或黑人「次文化」所吸納（儘管現代社會學家更喜歡將他們歸類為後者）。在 1970 年代，受到美國原住民文藝復興運動的啟發，包括摩爾人和藍馬坡格族在內的一些群體紛紛向印第安事務局（B.I.A.）申請承認他們為印第安部落。他們得到印第安行動主義分子的支持，卻被拒絕給予官方身份。畢竟，如果他們成功了，那可能會為各式各樣的脫離者開創一個危險先例——從「白人·原住民教會信徒」（white Peyotists）和嬉皮士，到黑人民族主義者、雅利安人（Aryans）、無政府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一個向任何人和所有人開放的「保留區」（reservation）！「歐洲企劃」絕不能承認野人的存在——對帝國的理想秩序而言，綠色混沌仍是一個太大的威脅。

本質上，摩爾人和藍馬坡格族人拒絕所有對他們血統的「歷時」（diachronic）或歷史解釋，而支持建基於被印第安人收養「傳說」的一種「剎時」（synchronic）自我認同。或者換個說法，他們稱自己為「印第安人」。試想像，如果每個希望「成為印第安人」的人都可以透過自我命名的行動來達到目的，那麼前往克洛坦的大隊將會是何其壯觀。那古老的秘術影子仍然纏繞着我們殘存的森林（順帶一說，自 18-19 世紀以來，這些殘存的森林在美國東北部大大增加了，皆因大片大片的農田上長出了灌木叢。廢奴主義哲學家 Thoreau 臨終時曾夢到「……印第安人……森林……」的回歸：受壓迫者的回歸）。

摩爾人和藍馬坡格族人當然有充分的唯物（materialist）理由去視自己為印第安人——畢竟他們有印第安祖先——但如果我們從「神話」及歷史的角度去看他們自我命名的行為，我們將會學到更多有關追求 TAZ 的實用的知識。部落社會存在着一些人類學家稱為 *Mannenbunden* 的圖騰社會，



他們熱衷於透過變形 (shapeshifting) 法術、透過化身成圖騰動物 (狼人、美洲豹薩滿、豹人、貓巫女等等) 來向「大自然」獻誠。在整個殖民社會的背景底下 (正如 Taussig 在《薩滿信仰、殖民主義與野人》(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中指出)，變形的力量是整個原住民文化中的固有概念。社會裏最受壓迫的一群人，透過其秘術知識的神話，獲得這種吊詭的力量，深令殖民者既畏懼又渴望。當然，那些原住民確實有一定的秘術知識；但有見帝國視原住民文化為一種「精神(荒)野性」(spiritual wild(er)ness)，那些原住民亦開始越來越有意識地代入那角色中。即使他們是被邊緣化的一群，這種邊緣，還是帶着魔術光環。在白人靠岸前，他們只是一群部落——現在，他們是「大自然的守護者」，是「大自然國度」的居民。最終反是殖民者自己被這個「神話」迷著了。每當一個美國人想要脫離社會或回歸大自然時，她一律地「成為印第安人」。又全心相信政府是可以被廢除 (整個伯克郡 (Berkshire) 地區宣佈了他們置身於「大自然國度」!)，組織茶黨的麻省激進民主黨員 (激進新教徒的精神後裔)，便是偽裝成印第安的「莫霍克人」(Mohawks)。那些殖民者突然發覺身在美洲的自己被邊緣化了 (相對歐洲的母國而言)，因此，她們代入了被邊緣化、原住民的角色，從而 (在某種意義上) 徵求分享她們的秘術力量及他們的神話光芒。從山地人 (Mountain Men) 到童子軍 (Boy Scouts)，「成為印第安人」的夢想在美國歷史、文化和意識的萬千河灘下川流不息。

與「仨種族 (tri-racial)」群體聯繫在一起的性意像證實了以下這假設。

「原住民」固然常是傷風敗俗的，但那些種族背叛者和脫離者一定是徹頭徹尾的多相變態 (polymorphous-perverse)。西印度海盜好男色，栗紅人和山地人與異族通婚，朱克家¹⁸和柯里柯克家沉迷於通姦和亂倫 (導致諸如多指 (趾) 症等突變)，那些孩子到處裸跑、公然自慰等等，不勝枚舉。回歸「大自然國度」似乎悖理地容許每一個「非自然」行徑；或者它看起來會是如此，如果我們相信那些清教 (Puritans) 和優生學論的話。又因為很多活在受壓抑、注重道德的種族主義社會中的人，其實暗地裏都渴望這些放蕩行為，他們便將這些慾望向外投射到這些邊緣化群體中，從而自我說服自身的文明和純潔尚存。而事實上某些邊緣化社區的而且確否決倫理共識——海盜們確實地辦到了！——且無疑地把一些文明社會下受壓抑的渴望付諸行動。(你不會嗎？) 成為「野性」常常是一種情慾上的行為，一種赤裸的行徑。

在離開「仨種族隔離者」這個題目之前，我想回顧一下尼采對「種族混合」的熱忱。他被混合文化的活力和美麗所吸引，不但提出以異族通婚來解決種族問題，還視之為消除盲目愛國和愛族的沙文主義¹⁹的一種新人性準則——他說不定是「精神遊牧」的先驅。一如該夢對當時下筆的尼采而言，他的夢想似乎到現在仍舊遙不可及。沙文主義的支配依然尚好。混合文化還是被淹沒在底層。然而，西印度海盜和栗紅人、以實瑪利人和摩爾人、藍馬坡格族和「柯里柯克家族」的自治區繼續留存，或他們的故事繼續流傳。這些跡象顯示出一種尼采可能會稱之為「以衝創意志去消失」(the Will to Power as Disappearance) 的表示。我們稍後必要再訪此題。

19. 沙文主義 (Chauvinism)：原指極端的、不合理的、過分的愛國主義 (因此也是一種民族主義)。如今的含義也囊括其他領域，主要指盲目熱愛自己所處的團體，並經常對其他團體懷有惡意與仇恨。史例有蘇俄列寧的大民族主義，納粹德國的雅利安主義；現例有中國的大漢族主義，美國本土的白人民族主義，慫恿性別歧視的男性沙文主義等。

音樂作為一種組織原則

Music as an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

然而，與此同時，讓我們鑑於 TAZ 的概念來談談古典無政府主義的歷史。

在「地圖封閉」之前，大量反極權主義的力量都獻身於「逃避現實」的公社裏，例如 Modern Times 烏托邦社區、各式各樣的小規模共產社區等諸如此類。有趣的是，它們當中的一些社區一開始就無意要「永遠」維持下去，而只是運作到該工程向成員帶來的滿足感褪色為止。以社會主義／烏托邦標準來說，這些都是「失敗」的實驗，因此我們對它們知之甚少。

當發覺逃越國境已不可行時，革命性的城市公社時代開始於歐洲着跡。巴黎、里昂和馬賽公社的短暫壽命不足以允許它們發展出永久性的特質，有人納悶這或是那些團體的原意。而對我們來說，公社最大的魅力在於它的精神。在這些年及之後那些年，無政府主義者開始實踐革命性的游牧行為，由一個起義漂移到另一個起義，力圖保活他們在起義片刻體會到的那份精神烈度。事實上，某些施蒂納（Stirnerite）／尼采式無政府主義者將這種活動視為目的本身，好讓他們得以永遠佔據着某個自治區——一個在戰爭和革命前夕或當中開啟的過渡區域（參照：Pynchon 在《重力彩虹》（Gravity's Rainbow）一書中的「區域」（Zone））。他們宣告，如果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一但成功了，他們倒會是第一個向新政翻臉的人。在未達到全面性的無政府狀態之前，他們無意停止。在1917年的俄羅斯，他們以欣喜迎接自由的蘇維埃（Soviet）：這是他們的目標。但蘇維埃中的 Bolsheviks 一背叛革命，那些個人無政府主義者是第一個重回戰場的人¹。而在王冠城事件²之後，所有無政府主義者理所當然地譴責蘇「聯」（違背「聯」字意），並繼續尋求新的起義。

Makhno 的烏克蘭¹和無政府主義的西班牙³是打算要長期維持下去的，且儘管處於持續戰爭的緊張關頭，兩者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這並不是說它們維持了「很長的時間」，但它們確實是成功地組織了起來，要不是外來的侵略，它們可能還會一直持續下去。有見及此，在戰間期的眾實驗中，我將集中講述魯莽的阜姆（Fiume）共和國，它更鮮為人知，且無久持之意。加布里埃爾·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一個頹廢派詩人⁴、藝術家、音樂家、美學家、花花公子、敢死隊飛行員的先鋒⁵、黑魔術師、天才和無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冒起的英雄，他擁有一支供他隨心使喚和指揮的小軍隊：「敢死隊」（Arditi）。為回應自身對冒險的渴望，他決定從南斯拉夫境內佔領阜姆城，並將它送給意大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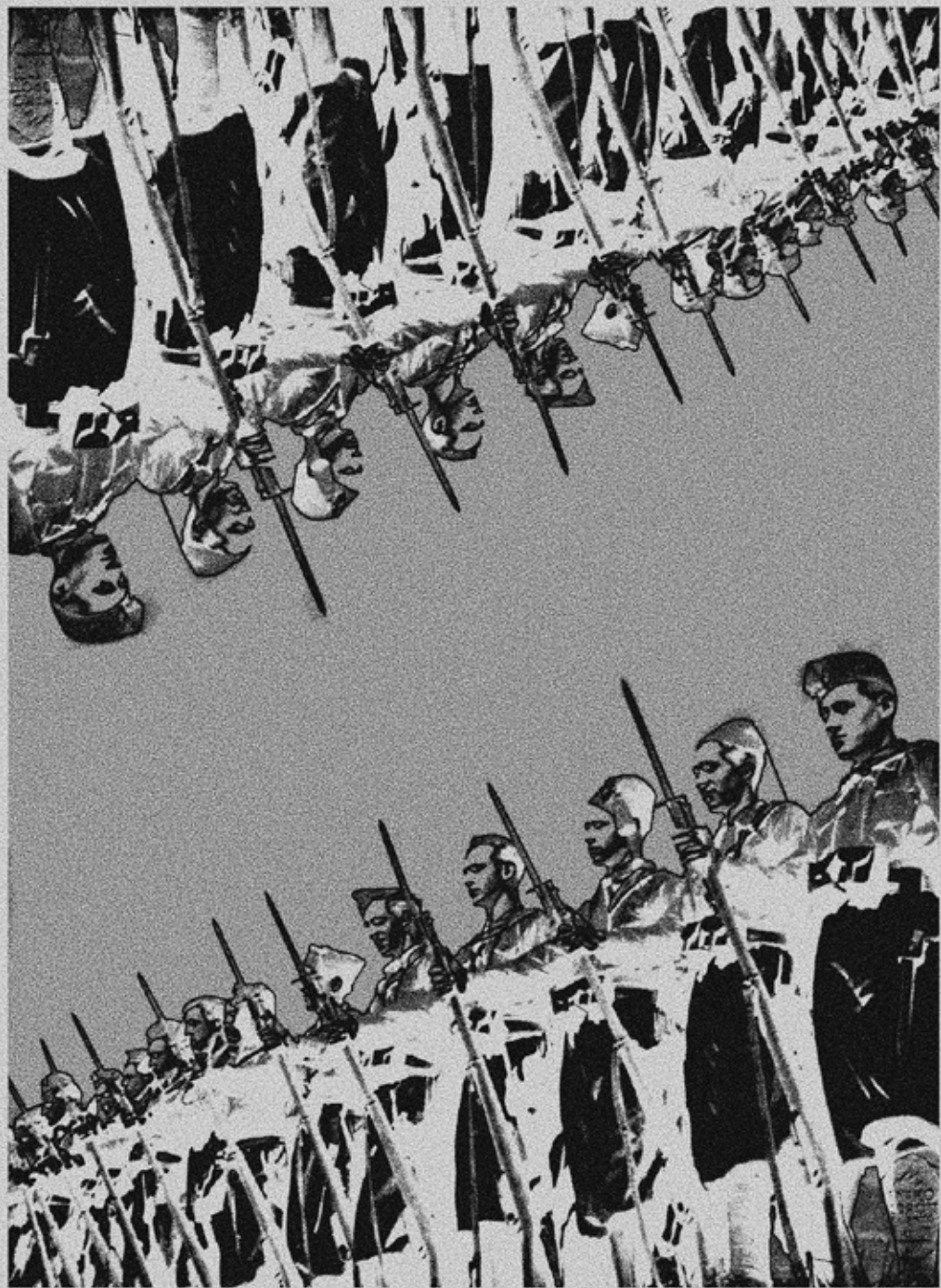
1. 歷史參考：烏克蘭地區的一支俗稱為黑軍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農民起義隊伍，與擁護沙皇及資產階級的白軍和列寧的蘇聯紅軍為敵進行獨立作戰。領導者 Makhno 之前曾參加過俄國 1905 年革命，並在革命初期支持紅軍。他之後自己組建了一個無政府主義社會——烏克蘭自由區（Makhnovia, 俗稱 Free Territory）。Makhno 被現代人尊稱為 Father Makhno。

2. 王冠城起義（Kronstadt rebellion）：以俄羅斯無政府主義革命家 Petrichenko 為首的水手、士兵和平民在海軍要塞王冠城（Kronstadt）發起的一次大型的起義。起因為掌權者對當地農民及工人因全國性饑荒引發的罷工進行暴虐鎮壓，皇冠城民眾提出一系列的要求提案作為回應，當中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釋放政治犯、內閣普選、廢除軍政社會等等。最後，Bolsheviks 政權以起義「無疑是法國反間諜機關的策劃」為理由出兵，事件以血腥而終，大部份起義軍最後逃亡至芬蘭。

3. 從歷史上看，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比其他地方同類的運動獲得了更多的支持和更大的影響，尤其是在 1936 - 39 年的西班牙內戰中擔負了重要的地位。例如當時風行巴塞羅那的無政府工團主義，以及在西班牙多省觀察到的以剝奪資產階級為標的非法行為運動。

4. 頹廢派（Decadent）：19 世紀晚期的藝術和文學運動，主要從美學角度批評當代的過剩文化和人工物質主義。其運動的特點是自我厭惡，憤世嫉俗，對大體的懷疑，以及對人類創造力優於邏輯世界和自然世界的信念。

5. 參考：維也納航襲（Flight over Vienna），1918 年 8 月 9 號



他跟情婦在威尼斯的一個公墓裏進行一場招魂儀式後，就出發去攻取阜姆，且不費吹灰之力就成功了。但意大利拒絕了他的慷慨奉獻，總理還稱他為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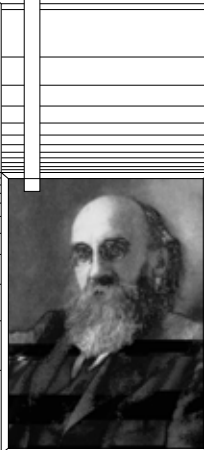
氣在頭上的鄧南遮決定宣佈獨立，看看他能如此逍遙法外多久。他跟他其中一個無政府主義朋友撰寫了憲法，宣佈音樂為該國家的中心原則。其海軍(由逃兵和米蘭無政府主義的海員工會主義者組成)自稱為烏斯科奇(Uscochi)——得名於一群曾在當地近海島嶼居住，以掠奪威尼斯和鄂圖曼的船運為生但久已絕跡的海盜。而現代的烏斯科奇則成功策動了一些粗野的妙計：幾艘富有的意大利商船突然為共和國帶來了前景：一箱箱的金庫！藝術家、不羈的文化人(Bohemians)、冒險家、無政府主義者(鄧南遮跟著著名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 Malatesta 心靈相通)、逃亡者和無國籍難民、同性戀者、執紼軍人(制服是黑色的，且帶有海盜骷髏圖——後來被納粹親衛隊(SS)偷去了)，以及形形色色怪模怪樣的改革家(包括佛教徒、通神學者(Theosophists)和吠檀多派(Vedantists))開始在阜姆大批湧現。派對從未停止。每天早上，鄧南遮會在他的露台上閱讀詩歌和宣言；晚上則會有一場音樂會，然後是煙花表演。這湊合了政府全部的活動。十八個月後，當美酒金錢都喝光花光、意大利軍艦終於出現，並向市政廳緩緩地投了幾炮，那些人連抵抗的幹勁都沒有了。

一如很多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鄧南遮後來轉向法西斯主義——事實上，是前工團主義者墨索里尼(Mussolini)他本人誘使這位詩人走上這條路的。到鄧南遮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時為時已晚：他已經年老病重。但領袖(Il Duce)墨索里尼還是下令將他滅口——推下露台——並將他塑造成「烈士」。至於阜姆，儘管它缺乏自由烏克蘭或巴塞隆拿的那份認真，但它的故事能解答我們深尋的奧義中的點滴。

就某方面而言，它是最後一個海盜烏托邦(或是唯一的現代例子)；另一方面，也許，它是第一個現代 TAZ。

我相信如果我們比較阜姆與 1968 年的巴黎起義（還有 70 年代初的意大利城市叛亂）以及美國逆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al）的公社及其無政府新左翼的影響，我們應該注意到某些相似之處，例如：美學理論⁶的重要性（參照情境主義者（Situationists））——又，可稱為「海盜經濟學」，靠社會過度生產的剩餘過上奢華的生活——就連色彩繽紛軍服的受歡迎程度——以及以音樂作為革命性社會變革的概念——最後是，它們都同樣帶着一種飛逝氛圍，那種繼續前進、變形，遷移到其他大學、山頂、貧民區、工廠、安全屋、廢棄農場，甚至其他現實（other planes of reality）的準備。沒有人嘗試要施加另一種革命專政，不論是在阜姆、巴黎，還是紐約州的 Millbrook。要麼世界會變，要麼世界不變。與此同時，繼續流動，並強烈地活着。

1919 年的慕尼黑蘇維埃（Munich Soviet，或 Bavaria Soviet，或 Council Republic）展示了 TAZ 的某些特徵，即使——像大多數革命那樣——它所宣稱的目標並不完全是「臨時」的。當時的無政府主義理論領導 Gustav Landauer 加入為文化部長，自由意志社會主義經濟家 Silvio Gesell 擔任經濟部長，連同其他反極權主義和激進自由社會主義者如詩人／劇作家 Erich Mühsam 和 Ernst Toller，以及無政府主義小說家 Ret Marut（筆名 B·Traven），為這個蘇維埃增添了明顯的無政府主義味道。Landauer 曾投入多年孤獨的光陰，致力於他就尼采、普魯東⁷、克魯泡特金⁸、施蒂納⁹、埃克哈特大師¹⁰、激進神秘主義者和浪漫式民族哲學（volk-philosophers）而撰寫的宏大綜論。因此他從一開始就知道這個蘇維埃注定會失敗；他只希望它能維持到足以被理解為止。蘇維埃的殉難創始人 Kurt Eisner 真切相信革命的基礎應當建立在詩歌和詩人之上。而大部分蘇維埃所在地 Bavaria 塊地按照計劃，投入於無政府社會主義相關經濟和社區的實驗。Landauer 草擬了免費學校制度和人民劇場的相關議案。對蘇維埃的支持都或多或少地局限於慕尼黑中最貧窮的工人階級和鄰近的不羈文化人社區，以及諸如漂鳥運動



從左到右 Kurt Eisner, Ret Marut, Gustav Landauer, Ernst Toller

6. 美學理論 (aesthetic theory) 是與藝術、美感、品味的本質的關注和欣賞有關的哲學分支。它也被定義為「對藝術，文化和自然的批判性反思」。在文中可解作不同思想信仰中附帶的儀式、習俗、和生活習慣 (如食物和衣着等) 對思想的實踐的重要性。作者文中的例子 —— 情景主義者 —— 儀式性地在歐洲城市裏「漂移」(Dérive) 及以「異軌」(Détournement) 的習俗創作新的藝術品，進行藝術化的「日常生活革命」。

7. 普魯東 (Proudhon): 無政府主義奠基人，他1840年出版的著作《什麼是所有權？》一書中，提出了讓他蜚聲於世的論點 —— 「財產是盜竊！」(Property is theft!)。

8. 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無政府共產主義學說中的表表者。他認為無政府狀態和共產主義是人類長期以來所追求的兩大理想，前者是理想的政治組織，後者是理想的經濟制度，兩者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正是建立在他自己提出的「互助論」的基礎之上。他強調，人類的互助精神之所以能夠得到不斷的發展，主要是由於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沒有受到強權勢力的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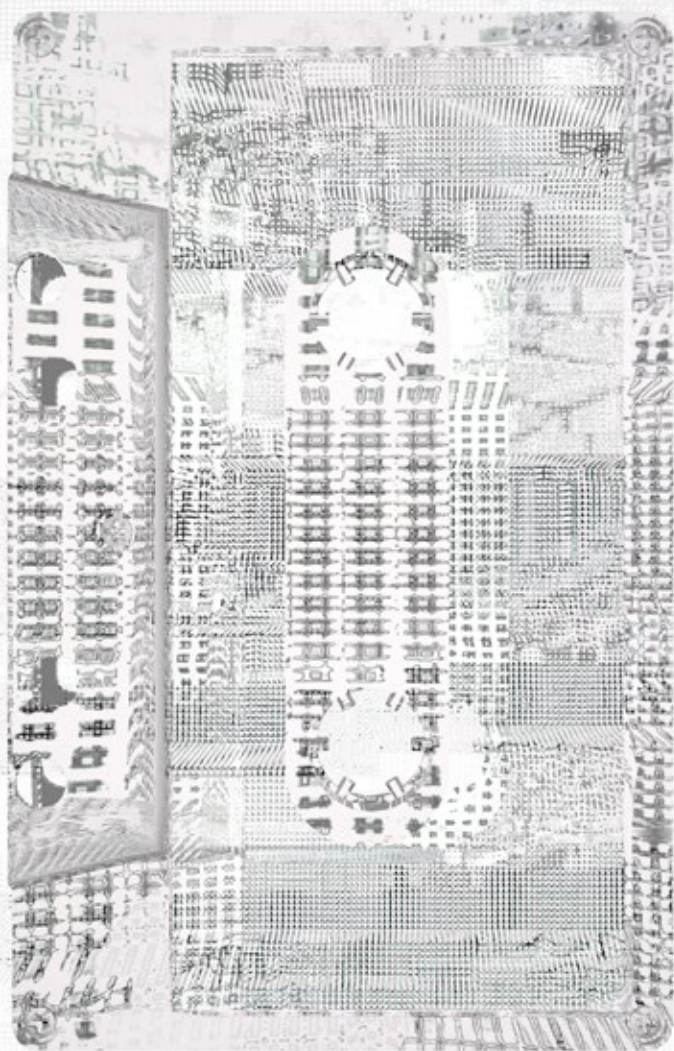
9. 施蒂納 (Stirner): 德國的哲學家，其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影響著後來的虛無主義、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特別是個人無政府主義。施蒂納主張一般社會所公認的制度 —— 包括國家的概念、「擁有財產是一種權利」的概念、擁有大自然權利的概念、和一般對社會的概念 —— 都只是幽靈在腦海裡作祟的幻象。

10. 埃克哈特大師 (Meister Eckhardt): 13-14 世紀德國神學家和神秘主義者，其關注的最主要問題是日常生活中持續精神實踐的原理的傳播。

(Wandervoge, 新浪漫主義青年運動)、猶太激進分子(如 Buber)、表現主義者(Expressionists)和其他邊緣群體。因此歷史學家都只視它為「咖啡廳共和國」(Coffeehouse Republic),並將之與馬克思和斯巴達黨員¹¹在戰後德國革命的參與作比較,以貶低其重要性。被共產黨的謀略所擊敗,最後又被受秘術/法西斯的圖勒會¹²影響的士兵所殺, Landauer 值得被紀念為聖人。然而,即使是現在的無政府主義者也傾向於誤解並譴責他「出賣」給「社會主義政府」。假如這個蘇維埃能夠持續至少一年,我們大概一提及其的美麗就會潸然淚下——那個春天裏最先開放的花兒還來不及枯萎,詩歌的靈魂和精神就已經被壓垮,而我們亦已然將它們都拋諸腦後。試想像一個城市,那裏的文化部長剛剛預告,學童們很快便要在那裏熟讀詩人 Walt Whitman 的作品——試想像,呼吸這樣一個城市的空氣,感受會如何。啊,若有時光機.....

11. 斯巴達同盟(Spartacist):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左翼於1915年建立的反戰革命組織。斯巴達同盟出版的政治通信《斯巴達克信札》激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德意志帝國內戰——十一月革命。

12. 圖勒會(Thule Society):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考察組」,秘密反猶太神秘主義社會網絡的掩護。因多名納粹高官均為該會會員,導致現代人質疑與會中的教義為納粹主義的靈感源頭。



以消失為權力意志

The Will to Power as Disappearance

Foucault、Baudrillard¹等人已經詳細討論過各種「消失」的模式。在此我想說明 TAZ 在某程度上是消失的一種策略。當理論家們談到社會的消失 (disappearance of the Social) 時，他們部分是指「社會革命」的不可能性，部分是指「國權」——權力的深淵、與權力會話的盡頭——的不可能性。那麼在這情況下，無政府主義提出的問題應該是：為什麼要費心去對抗一個已然失去所有意義、且已變成純粹擬像的「權力」？這樣的對抗只會了結於那些接手了所有軍械庫和監獄鑰匙、腦袋進屎的傻子行使一陣陣危險且醜陋的暴力。(也許這是一種美國人對崇高且隱晦的法德雙邊理論的粗略誤解。若是這樣，也很好；誰說套用一個想法是需要理解的呢？)

就我所理解，消失似乎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非常合邏輯的激進選項，它並不代表激進工程的災難或死亡。有別於憂鬱死亡狂迷對消失理論的虛無主義詮釋，我派意欲從理論中挖取有利於恆常更續的「日常生活革命」的策略：一個不能止息的抗爭，哪怕是遇到政治或社會革命最終的失敗；因為除了世界末日，沒有事情能終結日常生活，或我們對美好事物、對驚奇 (Marvelous) 的熱望。又如尼采所說，如果世界是有可能終止，邏輯上它已經發生；它那時沒有，所以它不會終止²。因此，正如蘇菲教徒所言，不論喝多少口禁酒，我們始終會將這種熾灼的乾渴帶進永恆。

1. 建議參考網上哲學出版平台 Sungrammata 關於布希亞 (Baudrillard) 的散文: The Art of Disappearance, Simon Bonneau, 2013

2. 《權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 第四卷: 紀律和教養 (Book IV: Discipline and Breeding), 第 1062 段, 尼采 (Nietzsche), 1885

Zerzan 和 Black 各自提到某些「抗拒的元素」(Elements of Refusal, Zerzan 的用語), 或許可以視為一種激進消失文化的徵兆, 生於有意和無意之間, 被這種文化影響的人遠比被任何左派或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更為多。這些姿態是為對抗制度而生的, 就那觀念而言是「消極」的——但每一個消極的姿態均暗示著一種「積極」的策略, 以取代而非只拒絕那可鄙的制度。

例如, 對抗學校教育的消極姿態是「自願文盲」。由於我不認同以社會改進為理, 對特定知識的慷慨崇拜, 因此對於四周的人就此現象而發的倒抽涼氣聲, 我是不太苟同的: 我對那些拒絕書本和書中垃圾的孩子深感同情。然而透過利用消失的能量, 積極的選項尚存。在家自學(home-schooling)和工藝學徒訓練有如曠課, 在監獄般的學校裏缺席。駭客訓練亦是另一種形式的「教育」, 且具「隱蔽性」的特徵。

對抗政治的大規模消極姿態包括直接不投票。「冷感」(對公共景觀(Spectacle)一種健康的厭倦)令全國過半數的人躊躇參與民調; 無政府主義從未達到過如斯佳績!(無政府主義亦跟最近人口普查的失敗無關。)再一次, 積極的平行方案是有的: 社會許多階層已經實踐以「網絡化」(networking)作為政治的替代選項; 非階層式組織甚至在無政府主義運動以外流行起來, 只因它有效可行。(ACT UP 和 Earth First! 就是兩個例子。相當奇特地, 匿名戒酒會(Alcoholics Anonymous)是另一個例子。)

對工作的抗拒則可採取曠工、醉酒上班、蓄意破壞及完全疏忽職守的形式——但它也可以帶來新的起義模式: 更多的自僱工作、更多地參與「黑市」經濟及「黑工」(lavoro nero)、詐騙福利及其他犯罪選項、大麻耕作等等——跟大罷工等傳統左派的對抗性策略相比, 這些大抵都是「隱蔽」活動。

抗拒教會? 嗯, 這裏的「消極姿態」很可能在於……看電視。但積極的替代選項還包括所有非獨裁形式的靈性, 從「不聚會的」基督教到新異教主義都有。

那些我稱之為「自由宗教」的教派——受到諸如混沌教和道教無政府主義等潮流影響的小型、自創、半嚴肅／半娛樂性的異教團體——它們遍佈美國邊緣地區，並在主流教會、電視福音的盲目信徒及枯燥乏味的新紀元³和消費主義以外，提供一條發展中的「第四道」⁴。對正統信仰的主要拒絕手段也可說是在於尼采的「私德」(private moralities)建構：「自由靈魂」(free spirits)的精神。

對家的消極性抗拒是「無家可歸」(homelessness)。大部分人會認為這是一種折磨，因為他們都不希望被迫進入游牧生活。但「無家可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是一種美德，一場冒險——至少對我們這時代的流浪漢，大規模全球性的非法佔屋者現象而言。

對家庭的消極性抗拒顯然是離婚，或是其他「崩潰」的徵兆。積極的替代選項源於認識到沒有核心家庭的生活可以更加快樂，隨之百花齊放——從單親父母到群婚再到性愛同好群體。「歐洲企劃」竭盡全力捍衛「家庭」——戀母情結之苦是掌控的核心手段。另類選項是存在的——只是它們必須一直隱藏着，特別是自從1980和90年代的反性愛戰爭運動(War against Sex)之後。

什麼是對藝術的抗拒？「消極姿態」是不會在「藝術罷工」這種無聊的虛無主義，或在塗污名畫的行為中體現的——當提及藝術一詞時，

3. 新紀元運動(New Age Movement): 一股源於東方，再經西方反文化浪潮衝擊下，而重新包裝去中心化宗教及靈性的社會思潮。參與團體吸收東方與西方的古老的精神與宗教傳統，如佛教的素食、神秘學的水晶能量、印度教的瑜珈、道教的太極，並且把那些觀念同現代科學的觀念融合在一起。雖然新紀元運動以靈修為題，但最終回歸物質主義，為各種新紀元書籍、音樂、手工藝品、「具治癒魔法」的水晶等消費主義商品開闢經濟圈。

4. 第四道(fourth way): 通常指三種通常的啟蒙方式——身體、精神、情感以外的另一種啟蒙方式，與三種傳統方式相反，第四道不要求修道者從平常生活退休，並隔離自我，反倒認為修道者能在日常生活細節中得以達成身體、精神、情感上的啟蒙。

在絕大部分人面上不知不覺地展露、幾乎一致的呆滯目光中就能目睹它。但「積極姿態」會包括什麼？想像一種謝絕大眾意興、自絕於歷史、甚至市場的美學，可能嗎？或至少是傾向於這樣做的美學？是想要以實體（presence）取代表象（representation）的？如何可以讓實體從區區表象中（或透過表象）被感受到？

「混沌語言論」⁵追蹤一種反複地從語言和意義系統的所有秩序中消失的實體；一種難以捉摸的實體，轉瞬即逝的、*latif*（意即「微妙的」，蘇菲派煉金術的一個術語）——奇異吸子周圍漸漸累積模因⁶，混沌地形成新的自發秩序。在此我們有一種介乎混沌與秩序之間的邊界美學，那邊緣，那「意外」的區域，在那兒，系統的崩潰可以等同啟蒙。

藝術家的消失，就是情境主義者口中的「對藝術的壓制和變賣」。但我們要從哪裏消失？我們以後還會被看到或提及嗎？我們去克洛坦——我們的命運會是如何？我們的藝術通通包含着一封予歷史的告別字條——「往克洛坦去了」——但它在哪兒，我們會在那裏做什麼？

首先：在此我們不是在說真的要從世界及其未來中消失：——不是說要逃到過去舊石器時代的「原始休閒社會」——沒有什麼永遠的烏托邦，什麼後山的退隱處，亦沒有什麼島嶼；也不是說有後·革命的烏托邦——很可能根本沒有革命！

5. 混沌語言論（Chaos Linguistics）新興的語言研究範式，採用混沌理論中的奇異吸引子對自然語言的研究。語言中存在的一種貌似無規律的複雜行動形態，難以用傳統語言學中機械性的文法和詞彙，粘磚砌牆的造句算式作解釋。這學說主張語言是潛有隨機性的多層次、非線性系統。語言與氣象變化、社會行為等現象一樣，無法用單一數據關係而必須用整體、連續的數據關係才能加以解釋、預測系統中的行為及趨勢。它暗示語言因其多變性，有克服表象和調解的可能。

6. 模因（memes）：與生物學中的基因類似的自我複製和傳播的信息結構。基因一詞的字面意思是組成生物的基本單位，而模因則是組成文化的基本單位。

——此外，沒有 VONU⁷，沒有無政府主義太空站——主張保持沉默的「布希亞式（Baudrillardian）消失」¹反而造就違背宗旨的過度順服（hyperconformity），我們亦不會接受。我對任何像 Rimbauds⁸的人——逃避藝術以追求隨便碰到的任何一個 Abyssinia——都沒有異議。但我們不能基於永不歸來這單純的舉措來發展一套美學，即使是消失的美學。透過說明我們不是 avant-garde⁹且世上根本沒有 avant-garde，我們已經寫下「往克洛坦去了」——那麼問題就變成，該如何展望在克洛坦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當我們不能說克洛坦存在於時間（譬如說石器時代或革命之後）或空間中，亦不會現身為烏托邦、現身為某些被遺忘的中西部小鎮，或是 Abyssinia。那個未經擬象介入的創造力國度在何方何時？倘若它可能存在，它就確實存在——但或許只能現身為一種貌似平行宇宙中另類現實般的存在，而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未學會如何去感知如此的存在。我們要在哪裏去找那些種子——像行人道縫隙長出的野草一樣，從異世界鑽進到我們世界來？有什麼線索、正確的搜索方向？靠指月之指？

我相信，或至少想要提出的是，解決「壓制和變賣」藝術的唯一方案取決於 TAZ 的崛起。我強烈反對有關 TAZ 本身只不過是一件區區的藝術品的評論，儘管它有一些呈那樣子的外觀。我真切認為 TAZ，對全然為創造性樂趣而生的藝術而言，唯一可能讓它發生的「時間」和「場所」，亦為凝聚和顯化 TAZ 的力量帶來實質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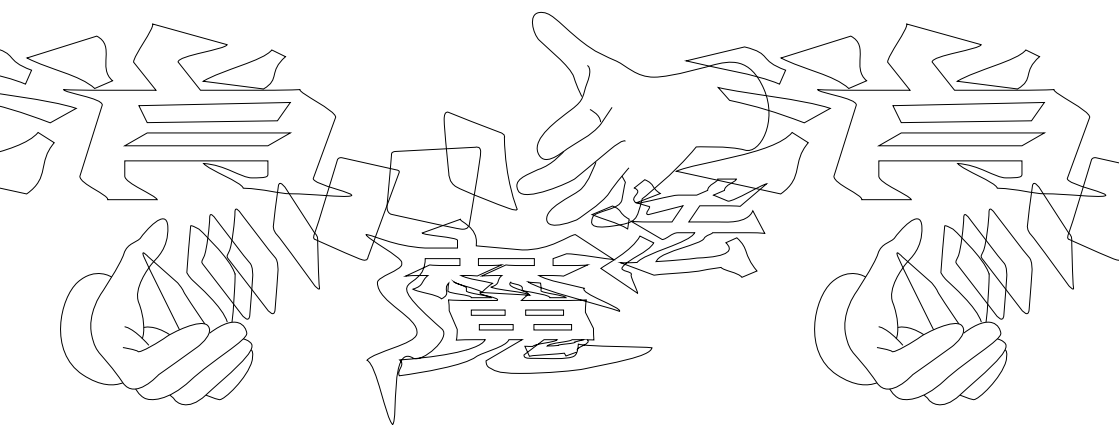
7. VONU 是 VOLuntary NonvULnerable 的尷尬縮寫。詞指達成避過壓迫的雷達、在壓榨手段下仍然刀槍不入的狀態和行為，盡可能地在公家和私家壓迫者權下流動式地生活在雷達難以偵測的區域中。

8. 蘭波（Rimbauds）：19世紀法國著名天才詩人，雖然僅在19歲就停筆不作，但其詩歌被封為象徵主義文學的先鋒，超現實主義文學的鼻祖。停筆後，他開始周遊列國，在當時的阿比西尼亞（Abyssinia）——現代的埃塞俄比亞從事軍火走私生意，最後因癌症逝世，享年37歲。

9. Avant-garde 常指涉新穎的或實驗性的作品或人物，尤其是對於藝術、文化及政治的層面。中文直譯為「前衛」。

藝術界裏的藝術已經成為一種商品；但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表象本身，以及對所有中介的抗拒。在 TAZ 裏，藝術根本不可能被變賣；反而會充當一種生活狀況。中介是更難克服的，但藝術家與藝術「用家」之間的所有屏障消除後，情況將趨向這樣：（正如 A.K. Coomaraswamy 所形容）「藝術家不是一種特殊的人，反倒每個人都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家。」

簡言之：消失不一定是場「意外」——除非是數學意義上的「拓撲突變（sudden topological change）」。所有在此勾勒的積極姿態似乎都涉及不同程度的隱蔽性，而非傳統的革命衝突。「新左派」從來沒有真正相信過它自身的存在，直至在晚間新聞報道中看到了自己。相比之下，新自治（New Autonomy）會滲透媒體並從內部顛覆「它」，要不就永遠不會被「看見」。TAZ 的存在，不但超越了掌控，還超越了定義，超越了倚靠「注視」和「命名」落實的奴役化手段，存在於國權的理解以外、國權的視力以外。



資訊巴比倫中的鼠洞

Ratholes in the Babylon of Information

作為一種有意識的激進手段，TAZ 會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出現：

1. 心理解放。就是說，我們必須實現那些不僅能讓自由成為可能、更成為事實的時刻和空間。我們必須了解自己在哪些方面真正受到壓迫，自己在哪些方面是在自我壓抑，或是被誘入了一種受觀念壓迫的思維。工作，作為例子，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它是一個比立法政治更加確鑿的苦難源頭。對我們來說，勞動異化遠比那些無威脅、過時的垂死意識形態危險。精神上沉溺於「理想」——實際上不過是我們對受害感心懷怨恨的投射——是無法助長我們計劃的。TAZ 並不是什麼虛無飄渺的烏托邦社會的序幕，戲中我們必須犧牲自己的性命，才能令我們孩子的孩子呼吸些許自由的空氣。以 TAZ 作布景是我們實現即時自治的必須，但它只在我們認己為自由身的情況下才能存在。

2. 反網絡必須擴張。現時它反映抽象概念多於實際情況。這是作為 TAZ 必要根基部件，小誌和 BBS 助長資訊交流，但這些資訊很少涉及自治生活所需的具體商品和服務。我們不在線上居住；幻想我們能寄住於其中只會陷入電子靈知主義裏有關超越肉體的虛假論述中。TAZ 是一個真實世界中的場所，我們要身在其中，就是處身在它之外。牽涉所有感官是必須的。維網在就像是一種新感官，但它必須加入其他感官——從中刪減其他感官是萬萬不可的，有如一場擾人的神秘出神狀態¹表演戲仿。沒有維網，TAZ 複合體是不可能完全實現的。但維網本身並不是目標。它是一種武器。

1. 出神狀態 (Trance): 催眠師據說有能力將人引入出神狀態之中，雖然出神期間被催眠者眼睛合上，當中不少人聲稱在出神時能看到具預言性的視像。

3. 掌控的機構 —— 「國權」 —— 必須（或者我們必須假設）繼續同時進行溶解和石化，必須在它目前的路線中行進，過程中，日漸壯大、歇斯底里的僵化蔓延以掩飾空虛，一個權力的深淵。當權力「消失」時，我們的權力意志必然為消失。

我們已經處理了可否只視 TAZ 為「僅僅的」藝術品的問題。但你還會要求知道它是否單純地僅為資訊巴比倫中的一個可憐老鼠洞，或更確切地說，不只是一個致力於海盜式寄生行為的經濟死胡同，連接得越來越緊密的地下迷宮？我會回答說，我寧願做一隻在牆中的老鼠，也不要做一隻困在籠裏的老鼠 —— 但我還會堅決認為 TAZ 超越這些範疇。

一個 TAZ 得以成功紮根其中的世界，可能近似於「P.M.」在他的空想小說《bolo'bolo》中預想的世界。也許 TAZ 就是一個「bolo原型」²。然而，因為 TAZ 現在存在着，它所代表的意義遠超過塵俗的消極或反文化退出主流社會的行為。我們已經提過脫離掌控那刻的節日氣氛，依附其身的自發性自我整律，不管多麼的短暫。這是帶「頓悟性」的時刻 —— 一個社會及個人層面上的高峰體驗。

解放是意識到的掙扎 —— 這是尼采的「自我超越」(self-overcoming) 的精髓。本論文也可能被看為尼采筆下流浪(wandering)的記號。流浪是漂移³的前身，情境主義的 *Dérive*，也是 Lyotard 定義的 *Driftwork*。我們可以預見一門全新的地理學，其中朝聖地圖裏的聖地都被高峰體驗

2. Bolo: 在《bolo'bolo》書中，核心家庭的概念被意識社區取代。Bolo是組成一個共同生活團體的基本單位，每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個性、信仰、或愛好選擇加入不同主題的bolo。

3. 漂移(dérive/drift): 情境主義者的基本實踐之一。在漂移中，一人或多人在一個特定時期要放下他們的關係、工作、休閒活動，他們的所有其他運動和行動的通常動機，讓他們自己被所發現的地形和遭遇的魅力牽引，無目的地漫遊。這種實習旨在為用家提供從僵硬的生活路線和見識中解放的可能，在死板的現代日常生活中增添隨機性。

和 TAZs 所取代：真正的心理地形科學，也許要被稱為「地緣自治學」（geo-autonomy）或「無政府主義預測學」（anarchoman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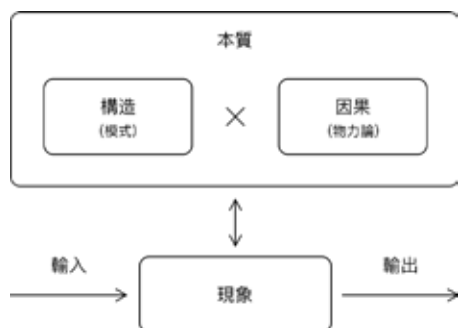
TAZ 涉及一種野性，從馴服性到（荒）野性（wild(er)ness）的一種成長，一種「回歸」，同時也是前進的一步。它亦要求一種混沌的「瑜伽」，一個在意識層面或具體生活上的「更高」秩序、透過「在混沌的波前衝浪」來達致的計劃，一個錯綜複雜的物力論⁴計劃。TAZ 是一門狂野卻溫和地持續上升的生活藝術——是引誘者而不是強姦犯，是走私者而不是嗜血海盜，是舞者而不是末世論者。

承認吧，我們參加過那些派對——頃夜之間就實現了慾望得以滿足的共和國。我們能不承認，當晚的政治力度予我們的真實感和力量，比起諸如整個美國政府來得更大嗎？我們提過的一些「派對」維持了二或三年。這是不值得想像、值得為之奮鬥的事？來讓我們研究隱蔽性、維網運作、精神遊牧主義——誰知道我們可能會實現什麼？

4. 物力論（Dynamism），指的是長時間來看，模式所形成的現象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和動態，也就是會呈現什麼樣的圖形。比方說，有一個模式是如果一天讀書的時間增加一小時，成績就會提高一個單位。

遵循這個單純的模式，將讀書時間增加為兩小時，成績就可以提高二個單位。

但是，若讀書時間變成十個小時，情況會如何呢？成績或許一時之間會上升，但絕對無法長期持續。搞不好還會變得討厭讀書，甚至精神衰弱，成績下滑。像這樣以較長的時間軸，觀察模式各要素的動態因果關係，就是物力論。





逆權本論

Principles of the Anti-State

去中心化的我們，行動是自發的，物資是眾籌的，理念是不約地異口同聲的。這種自組織的民間起義，因缺乏基點，當與「有形」的階級式組織迎面交往時，我們呈「無形」（《孫子兵法》中的「形」），能從各社會階級、工作單位現身，再剎時滅跡於茫茫人海之中，所以最難粉碎，從而造就了我們的續航力。但大海一望無際又暗湧重重，只有一條船的話終會被吞噬，在這種非對稱戰爭中，盟友總是要結。

即使內地人在網上和現實上對我們的自由抗爭處處阻攔，又多加誹謗，但假如我們將十四億人一概而論的話，恐怕就陷入了有如大漢族主義中「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過時態度。在這情況下，以毒攻毒只會造成進一步分化。逆權之本，立於權道之上，如沉淪到與權道同行，背棄包容的美德，恐失人心歸向。

所謂，不知者不罪，在籠裏出生的鳥兒會誤將飛翔當成疾病，要到籠破鳥飛時，籠中鳥才能領會到展翅的真諦。幸好，部分自我解放的內地年青人還可以依靠翻牆到未被中共審查的互聯網裏狩獵資訊，在那裏第一次接觸到異於共產的價值觀，例如西方新聞自由、公民社會、自由主義等等。又，內地的中產階級人數隨着中國市場在近年對外開放而激烈上升，社會中比較有經濟優勢的一群人的政治意識往往較貧乏人口高。在成熟的西方國家，投票參與率和社會階級不平等之間存在強烈和負面的聯繫¹。雖然大部分新一代的大陸青年現在被拜物教所迷惑，以致其政治關注度被新國際金錢引入的消費者主義吞噬，一當炫耀性

1. Lijphart, 1997

消費變成平凡景觀、物質富裕變成家常便飯，人們便會去追求心靈上的富裕。隨着保八掉到保六的經濟增長放緩，加上國際資訊內洩動搖黨製管視角，內地的政治氣候有望升溫，事必有轉機。在這時代降臨之前，我們可做的，除了靜待籠中鳥開竅、與我軍並肩共戰，就只有壓抑我們人性中醜陋的種族主義本性。

退後一步細想，我們相對的其實並不是大陸人，亦不是漢人，或是操國語的人，我們相對的是一種思想。那種思想以大漢族主義的種族歧視歪理為前提，扼殺民眾意識狀態的多元性，主張強制同化。在他們眼內，不管你是維吾爾族人，西藏人，還是香港人，通通是同氣共類。三者均為他們畏懼的多元性中的其中一元²。

追求多元是拒絕一元的最佳積極選項。從社會模控學³的邏輯中推斷，一元化的思想令人民的反動容易預料；相反地，不經管理和控制的多元社會環境因人與人之間的意識狀態互異，難以被統一地調節及操縱。試想，如果香港人，像內地人一樣，從未聽聞過、或享受過新聞自由，我們會有偵測到大型傳媒機構壟斷公眾資訊內容的直覺嗎？

香港文化越多元，我們的政治游擊隊就越無形。我們必須奮力地向不同階級、年齡、宗教、膚色、語言群組推進，與所有支持民主和自由的組別相交。政治游擊隊再不只是穿黑衣的、介乎於13至22歲的、廣東面孔的、左派的、操純正廣東話的——而是更加無形、更加「估你唔到」的大雜燴戰團。

在參與長期性的非對稱戰爭時，我們要緊記，非我族類，其心或通或異——尋找答案的唯一方法，是謙虛的而不作假定的對話。

塵緣，2019年初冬

2. 中共《九號文件》，2016

3. 參考 27 頁腳註 10 —— 模控學 (Cybernetics)



For when things get much worse.

